

目 录

日本投降前后冠县人民子弟兵对敌斗争

概况..... 徐万夫(1)

冀南南下干部组成情况和经过..... 赵 畅(24)

两战时期冠县的敌祸与党的经济政策

.....张怀轩整理(47)

“冠堂边”的借粮减息斗争

..... 许世平、李荫川(69)

崔竹宣传略.....赵长聚整理(75)

一腔热血化宏图——王桐春烈士的英雄事迹

..... 公安局政研室(87)

悼念王桐春老师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

..... 张怀轩(96)

怀念朱冠友..... 司洛路(97)

清末民初冠县城关平面图及其说明	姚汝林(105)
冠县村名由来	郝瑞琛(131)
冠县西沙河的变迁	李义善(141)
一九三七年冠县大地震	梁增生(154)
冠县气象灾害史略	戴万德(159)
冠县一中简介	珍堂、士焯、树椿(170)
基督教在冠县	刘圣民、孙学勤供稿 赵秀玲整理(177)
元如问和赵天锡	任金光(184)
查拳名师张英振之子来信	北京市八十八中政教处张子忠(194)
冠县部分文物及说明	文史科搜集(197)
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史料启事	(201)

日本投降前后冠县 人民子弟兵对敌斗争概况

徐 万 夫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日寇、伪军、顽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被人民武装力量打得焦头烂额，狼狽不堪。

七月中旬，驻冠县的日伪军放弃冠县撤到临清，上级指示将各区游击队改编，二、三区队编为县大队三连；四、六区队编入县大队四连；五区队编入县大队二连，我当时在五区游击队任指导员，也随之到二连工作。一区已划归永智县，因此该队缺一区队。整编在冠县南关南面的赵家坟大松林里进行。大队干部有县大队长王西元，政治委员孙洪，分支书李贵章同

志。改编几天后，大队长王西元带一、四连编入军分区二十四团。他们临走之前，县政府召开大会，欢送子弟兵上前方，祝愿子弟兵打胜仗。

大约七月底，八月初，县大队奉命攻打沙镇，我大队由孙洪同志带领，经一晚的急行军到达沙镇东面的许楼（离沙镇约一公里）待命，其任务是配合莘县大队和二十四团担任攻坚。该据点驻的是郭培德的封顽武装，共有二百多人枪。据点设有大碉堡和两道围墙壕沟。那时县大队装备很差，主要是步枪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硬攻是不行的，我们采取土法作业，挖壕沟运动部队。壕沟挖二米深，一米多宽，一直挖到据点附近。一天下午，天下着小雨，敌人冲出东门，试着突围，被我冠县大队一阵排枪、手榴弹打了下去，以后敌人再也没有敢突围。我们在许楼住了约一周左右，在一天晚上，部队开始攻击，因敌人火力很猛，再

加工工事坚固，所以攻了几次未能拿下，这样部队停止了进攻，继续围困。至八月中旬，我们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部队一片欢腾。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上级决定暂停攻打沙镇，命令我们返回冠县。返后住在冠县城里，永智县大队驻城北几个三里庄，二十四团驻城北几个八里庄。几天后，这几支武装在冠县文庙会师，并将冠县县大队和永智县大队改编成肖永智支队。黄跃华为支队长，孙洪为政委（兼冠县县委书记），苑化冰为参谋长，郭现为政治部主任。支队辖七个连，原冠县县大队二连和三连，分别编为支队的四连和五连，原永智县大队分别编为支队的一、二、三、六、七连，我任五连指导员。这个时候，部队学习了“号外”即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命令所有日、伪军必须向当地抗日武装投降缴械，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将予以消灭，以扩大解放

区。部队边休整边学习。大约六、七天后，我们支队和二十四团在冠县文庙会合，由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作了战斗动员。我分区武装编入第二梯队，王宏坤为总指挥。次日，我支队往清平县进发，那时清平有新、旧两个县城，新县城设在康庄，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支队开到康庄东南方向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庄驻下来，部队派出侦察员对康庄进行侦察。三、四天后，弄清了康庄周围的地形、城堡、壕沟的构筑，并得知守城敌人大部分已经撤离，驻在康庄东北方向十多里处。城内只有少量守备部队。这时支队决定夜间一点钟攻击，选择的突破口在南面。突击队是一连和五连。孙洪同志亲自指挥五连打康庄南门西段，一连打东段。我们五连借着夜色的掩护，爬上城墙，敌人没有发觉。连队顺着城墙往南门冲，待冲到南门城楼缴敌人的械时，敌人才从梦中惊醒，

仓惶应战，我们很快将南门守敌30余人全部歼灭，我军仅牺牲一人。南门敌人被歼灭后，我五连继续往里进攻，为造声势震慑敌人，我们走到一老乡家，向其说明，借用他的一堆柴草，日后照价赔偿。老乡听说我们是八路军，满口答应无偿赠送。我们就将这堆柴草点着了火。一下子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吓得城内守敌有的逃跑，有的举枪投降。天还未亮，就结束了战斗，拿下了康庄，俘敌七十余人，缴获各种武器近百支，钢盔150余顶，粮食、棉花几万斤，还有其他军用物资。五连战士130多人，全部戴上钢盔。这一旗开得胜的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军民一片欢腾。五连从缴获的粮食中拿出一口袋小麦（约150斤），赔偿了借给柴火的老乡，老人高兴的流了泪。群众劳军，战士开战后会议，总结了经验，以利再战。

部队在康庄驻了几天后，照了集体像，即

转移到康庄西面的水城屯，进行短时间的练兵。主要训练爬长梯和投手榴弹。爬长梯要求爬得快，爬得高，一丈五尺长的梯子，要求在五秒钟内爬完；原地投手榴弹，要一口气投几十枚。战士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就在地里干活，参军后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训练中很能吃苦，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收效很大。同时还进行了突击队教育，讲清突击队下属的突击组、梯子组、手榴弹组的分工及合作，主攻与佯攻的关系等等，使每个战士懂得了自己的责任。在八月下旬的一天，部队接到攻打临清的命令，并决定永智支队为主攻部队之一。一天下午，部队到水城屯西面十余里一个村庄集结，军分区宣传队的同志扭着秧歌，带着纸烟、红枣、梨子前来慰问。当时梨子还未成熟，宣传队的同志说：“这是枣和生梨，祝你们早胜利。”

攻打临清的作战部署是：十九团负责打西南关，二十四团攻打砖城南门，马颊河支队负责打砖城东门，永智支队负责打砖城北门（西面是卫河）。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作了战斗动员。并决定：先由十九团打响后，其余部队再开始攻击。同时明确了各项战斗纪律。下午约四点多，部队开始往临清进军，永支决定一、五连为主攻连，孙洪政委带一警卫员、一司号员亲自指挥五连。战斗前，部队经过几小时的急行军，于深夜十二时前赶到临清城北约一华里处就地隐蔽待命。凌晨一时许，我们听到西南关的枪声，五连一阵猛跑便到了城墙下，手榴弹组向城上敌人投掷手榴弹，梯子组在机枪和烟幕的掩护下，很快把梯子靠城墙架好，突击组正在攀梯上城。这时城上的敌人拼死挣扎，并用力向外推歪了一截城墙，砖块砸断了梯子，也砸伤了不少战士，突击队受到一

些损失。这时三排长周学昌爬在梯子的最前面，被敌人推下的城垛砖压在墙根下，他从残砖堆里钻出来，不顾伤痛，又爬了上去，终于第一个登上了城墙，痛击了敌人。我五连预备队迅速接着往上攻，但备用梯子长度不够，战士们就站在梯子上搭人梯往上爬，城上的敌人拼命反击，敌我枪声响成一片，我主攻部队用机枪、排枪、手榴弹等猛烈的火力掩护着突击部队进攻，双方不断有人伤亡，战斗处于白热化状态。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政委孙洪同志命令司号员小董（冠县城南何仲人，约十四、五岁）吹冲锋号，命令整个永智部队全线攻击，战士们勇气倍增，我五连迅速攻上了北城墙，在城墙上打出了胜利的信号，沿城墙一线勇猛地连续攻击，迫使守城的敌人从城上退到北城楼上。我五连在北城楼上俘敌30余人，其余残敌跑到北城门楼里西边一庙院内坚守。部队解决

城墙上的敌人后，继续向城内敌据点进攻，我们占领了北门里的文庙，敌人占距文庙约200米处的一座庙宇，我五连组织了两次冲锋，这时天已亮了，未拿下敌人阵地，为避免更大伤亡，我们停止了硬攻。将部队布置在文庙以北一线，部队刚刚布置好，孙洪政委带着警卫员来到文庙，他要亲自去察看部队的分布情况。于是，我陪同他前往，孙洪同志走在前面，我在中间，警卫员小许走在后面。出了庙，往两军对垒的我方阵地走去，文庙西面红楼据点（敌人大本营）的敌人向我方开炮，一发炮弹打在警卫员身上，当时就牺牲了，孙洪同志回头看了警卫员小许同志一眼，心情十分沉重，让其他战士抬下了这位年轻战友的遗体，继续前进，这时我看到孙洪同志耳朵旁也受了伤，血流到脖子上，我说：“孙政委您头部负伤了。”孙洪同志用手一摸一把鲜血，这才知道

自己负伤。却说：“没关系。”我叫来卫生员，给孙洪同志赶忙包扎好伤口，又继续察看部队的分布情况。回到文庙后，敌人以激烈的炮火向我前沿阵地连续反扑两次，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下午，我们奉命撤退到城东北的三里庄。约五时许，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五连战士刚吃完干粮，就接到支队命令，让五连马上出发放步哨，地点是由三里庄至卫河边。预料敌人可能突围，于是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们走到卫河边的大斜塔，天已黑了下来，随即沿城北大水渠往回返，还未到三里庄，就遇上城内敌人向北突围，被我五连迎头阻住，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为夜间能识别敌我，我们全体指战员左臂上扎上了白毛巾，我们在三里庄的部队听到枪声后，便火速增援上来，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被俘和击毙。第二天早晨打扫战场时，到处发现敌人丢弃的枪

支、弹药和衣物，战士们拿着缴获的胜利品互相祝贺。有一些致重伤员横三竖四的躺在地上向我们求饶，我们遵照俘虏政策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他们包扎伤口，抬了下来。

临清解放后，永智支队即奉命向东挺进，二梯队司令员王宏坤将一门要用十头骡子、两匹马拉着的平射大炮交给永智支队保护，并命令支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炮丢失和损坏。支队又将这一护炮任务交给了五连，孙洪同志再三嘱咐我们四个连级干部：“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门大炮，如果保不住，要杀你们四个的脑袋。”我们齐声回答：请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这门炮一共只有十来发炮弹，攻临清时打了两发，所以不但炮万分宝贵，炮弹也非常宝贵。

部队经过一天的行军，晚上约十一时左右，宿在清平南面一村庄，这时，我连哨兵带

着一个伪军来到连部，这一伪军误认我部为匪军“郭团”，是前来求援的。他说他们被八路军打散了，尚有几十个人在西村。于是我们将这一情况向支队首长作了汇报。支队首长命令我们五连前去消灭这股敌人，我们随即带上这个伪军作响导，往西走了约四华里，进入村庄，见到这几十个敌人狼狈不堪，在村南面靠墙坐着睡着了，我全连战士喊着“缴枪不杀”冲向敌人，这时敌人被这突然的杀声惊醒，有的坐着向我们缴了枪，有的亡命之徒，则拼命抵抗，有的狂奔乱跑，我战士凭着月光奋力追赶敌人。副连长王玉亭一手掐住了敌军头目的脖子，命令他将驳壳枪放下，这个伪军头目只得乖乖的丢下了手中的武器，当了俘虏。这次战斗仅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我无一伤亡，敌军四十余人无一漏网，全部被俘，并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部队在该村住了一夜，次日清

晨继续东进。

我连继前夜的胜利，保护着这门大炮，随永支其他连队沿公路行进到清平县南部，离五龙堂（庙宇）据点北面约400米处，据点的敌人用迫击炮向五连开了两炮（五连走在最后）战士们对敌人的疯狂挑衅恨之入骨，当即把炮停下，调转炮口，准备开炮还击，被我们几个连级干部阻止，部队继续行进，当天早饭前我部即在离五龙堂据点东南面的二华里处一个村庄住下。九时左右，孙洪同志带五连的连、排级干部到据点附近看了地形，然后命令五连开到据点边沿，他向敌人喊话，劝其投降，敌人答复：“当官的不在，你们等一等。”孙洪同志即令敌人必须下午三点前做具体答复。下午一时许，我五连转移到五龙堂西南约一华里处一个叫王方的村庄住下。到了下午三点，继续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敌人仍然借故推托，不

愿投降。这时，孙洪同志命令再给敌人五分钟的考虑时间。敌人企图依仗五龙堂据点的坚固工事（据点外有二道壕沟，每道沟约二丈宽，一丈二尺深，而且满水，水下插有削尖的木桩），围墙上架有滚木以及配有一门迫击炮，二具掷弹筒和一挺机枪、一百多支步枪等等），所以对我们的劝降不愿接受。时间一秒秒的过去，到了限定的考虑时间，孙洪同志又问敌人“愿不愿投降？”敌人未回答，于是就向五连下达攻击命令。我连战士早等得不耐烦了，接到攻击命令，似猛虎出山，顶着盖有湿棉被的桌子号称“土坦克”，向前冲锋，很快跑到据点南门外，敌人这时慌了手脚，连忙答应缴械投降，慌忙打开大门，放下吊桥，我五连进去后，命令敌人放下武器，站好队，以便清点人枪。敌人百依百顺，按我们提的条件去做。我们清点的结果是：俘虏100余人、迫击炮一

门、掷弹筒两具、马步枪100余支、战马五匹、通讯器材一部。我们收缴了人枪后，将他们带到我们驻地王方。这时一俘虏兵向我们报告说：敌人埋藏了一挺机枪和三支白朗宁枪，并说出了藏枪的地点。我们听后，即令其带路将枪取出。后来对这一俘虏进行了奖励。看来敌人早已做了被攻克投降的准备，不然不会将武器埋藏起来。

五龙堂一带是个新区，这里的群众对我们部队很陌生，我们没有群众基础，为此，孙洪同志召开了支队紧急政治工作会议，连以上的政治干部都参加了。他指出这里是新区，我们不但要打好仗，而且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这里的老百姓提高觉悟，最后，他要求每个连队都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大好形势，破除谣言、消除群众与我们的隔阂，密切军民关系，并决定从缴获的粮食、棉花中拿出一部分，分

给贫苦群众。会后各连马上分头去执行这项新的任务。

我们在群众工作中，曾经遇到一些困难，将粮食、棉花分给贫苦乡亲时，他们不敢接受，我们就寻找积极分子，由积极分子带头接受我军分发的物品，有了带头的，其他人也敢接受了。后来我们遇上一位年约七十开外的孤老大娘，家无一粒米，身无完整的一件衣，她来到我们驻地诉说苦衷，我们两个战士将一袋小麦（约百余斤）、十多斤棉花送到她家中，并告诉她，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是穷苦人的部队，老人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来，拉着两个战士的手不愿放开。我们在当地只驻了三、四天的光景，局面就打开了，部队离开五龙堂村时，那里的人民与我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王方停留几天后，又接到向清平旧城进

军的命令。这次攻打清平旧城是兄弟部队主攻，永支负责打增援的敌人，我永支行至清平旧城西南十余里的村庄时，停止待命，次日我连将负责保护的大炮交给了兄弟部队。由他们主攻，我部就地待防，准备打增援。当夜，主攻部队开始攻击旧城，激战一小时左右，拿下了旧城。主攻部队在旧城住了两三天，即由我永支前去接防。我们在旧城休整了二十多天，敌人在夜间向我们攻过两次，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在旧城休整后，又奉命往高唐县的郭庄（据点）进军，程子方的独立团接我们的防，我们行至郭庄东南的焦庄住下，呆了四、五天又转移至郭庄西南约两华里的一个村庄，准备攻打郭庄。郭庄的围墙上安有两道电网，滚木，围墙外有两道壕沟，两道沟内水都是满的。据点内住有号称一千人的伪军，都是一些

无恶不作的土匪、汉奸和国民党杂牌军，匪首是郭金城。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惨遭这股敌人的蹂躏，对其恨之入骨。我部队开始围攻郭庄时，敌人还故作镇静，让平时供郭匪取乐的两班大戏锣鼓喧天地唱起了高调，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惊弓之鸟，非常恐慌。夜间围墙周围都高悬照明灯，防备我偷袭。

大约在十月上旬，部队对郭庄发起进攻，战斗是在午夜开始的，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永智支队和二十四团及另一兄弟团负责主攻，二十四团打东门，另一兄弟团打西门，永支打南门，马颊河支队佯攻北面。我永支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一连和五连，黄跃华同志指挥一连，孙洪同志指挥五连。突破口选择在南门，五连打南门以西。这两位领导同志在火线上不下战壕，来回走动在沟上，指挥着部队的运动和突击。特别是孙洪同志在临清战役时，头部负伤

尚未痊愈，但他不管伤口的疼痛，和战士们并肩战斗。这两位指挥员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他们冒着雨点般的敌弹，冲锋陷阵，第一个倒下去，第二个又紧接向上爬，战士们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的心和不怕死精神，胜利地越过了两道一丈多深的壕沟，攀登上敌人的围墙。我连刚入伍的战士谢云安（冠县后小化村人）一再要求参加突击队，我们考虑到他是新战士，没有战斗经验，未予同意。但当发起攻击时，他竟跟着突击组越过障碍，爬上围墙，当即身负重伤，光荣牺牲。青年战士绳则兴又接着向上爬，结果他也身负重伤，倒了下来。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爬上围墙以后，不少战士遇上了电网，电网是日本鬼子安装的，战士们不懂电的知识，又没有电工工具，所以伤亡比较

大。这时东方现出鱼肚白，部队只好撤出了战斗。因战斗十分激烈，所以部分伤员和部分牺牲了的战士的尸体没有救护下来，被敌人的火力压在墙根下。攻打西面的兄弟团的一部分亦未撤下来，赵健民司令当即命令部队把所有机枪集中起来向敌人射击，以掩护兄弟部队后撤和抢救伤员。攻坚的战士接到命令后，一阵冲锋，救出了伤员，接出兄弟部队。

战斗开始的时候，曾用大炮轰了一炮，但没有打准，天亮时在永支驻地村东头，王宏坤司令员追查原因，炮目报告说：是炮兵学员打的，请首长批准我再打一炮。司令员问：“你能不能打准？”炮目答：“打不准，杀我的头。”于是王宏坤同志同意了炮目的请求，炮目随即调转炮口，一炮轰垮两座碉堡。

据点未拿下，战斗在继续进行，指挥部命令攻坚部队在郭庄周围利用康庄战斗中缴获

的棉包修筑碉堡，工事修得比郭庄据点的围墙还高，而且一夜修成。修好后，又在夜间发起攻击，还是因电网的阻碍未能拿下。这时敌人发觉我们的碉堡是用棉花包垒的。一天夜间，他们在火力掩护下冲出围墙，烧了我们几处工事，我们伤亡严重，立即撤去棉包工事，接着从群众中收荆条编成粮囤，继续修筑碉堡，囤内装湿土，我们就是这样白天围绕敌人夜晚修筑工事，围敌达70多天，敌人弹尽粮绝，只靠济南之敌空投弹粮，但飞机不敢低飞，所以空投物品往往落在据点外，为我享用。后来敌人又假投降，“要讲和”这时永支已奉命转移到郭庄东北角三十里铺，“讲和”的第二天，郭庄之敌开始突围，我军早有准备，故歼敌大半，匪首郭金城带领残兵败将逃窜，我军打进郭庄后，缴获了敌人的许多军用物资，充实了我军实力。

郭庄解放后，永智支队和程子方独立团合编为35团，永智支队编为一、二营，独立团编为第三营。黄跃华为团长，孙洪为政委，程子方为副团长，张含复为参谋长，李振北为政治主任。整编后，35团由聊城开赴冠县、堂邑休整，一、二营驻冠县，三营驻堂邑。一、二营回冠县后，地方政府和乡亲们拿出年货慰问子弟兵，军队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拥政爱民，把驻地打扫的干干净净，把群众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并把自己准备过春节的物资拿出来给群众和慰问烈军属。春节间我们组织了军民联欢会，锣鼓喧天，非常热闹。

1946春节后，35团改为二纵六旅16团，孙洪同志仍担任政委。自此，这支武装正式成了“刘邓”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初春，参加了攻打永年战斗，47年又参加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予北战役”。之后，又由“刘邓”首

长亲自指挥，突破“黄河天险”的防线，踏上了南下的新的征途，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为彻底摧毁蒋家王朝转战在大别山区。

冀南南下干部的组成情况和经过

赵 畅

按：赵畅同志这篇文章写明了冀南区第四批南下干部的一些组成情况。冠县南下干部第一批在1946年冬，计13人，去豫、皖、苏工作；第二批在1947年6月，计23人（其中县级3人，区级5人），随军南下大别山；第三批在1947年10月，包括勤杂人员共145人（其中县级1人，区级11人），有35人去豫西开展工作，其余的到大别山；第四批在1949年，共76人（其中县级6人，区级27人），去湖南工作。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灭亡。为适

应这一新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1948年底和1949年初，冀南区党委决定在全区组织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200个区委共有干部和勤杂人员4000多人的队伍随军南下（其中干部为3500多人，勤杂人员500多人），到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以巩固新的解放区，利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实现彻底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

（一）

1948年冬，冀南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部署安排组织南下干部的工作。地委书记会议结束之后，各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具体落实了组织南下干部的任务。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之后，为了迅速完成组织南下干部的任务，1949年春节前夕，县委首先把区委书记集中起来开会进行动员，紧接着召开

全县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在各县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主要是解决四个问题：①讲清当前的形势和组织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的伟大战略意义；②讲清这次组织干部南下，是成建制的南下。原则是在现有的县、区干部中，要有二分之一的干部南下，二分之一的干部留下工作；③发动组织南下干部的方法，是在学习讨论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实行自愿报名和组织批准相结合来确定南下或留下；④根据当时干部对南方情况生疏和“宁向北走三千，不向南移一砖”的传统习惯思想，进行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和进行个人服从组织的教育，并号召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带头报名南下。经过讨论发动，干部的情绪十分高涨，参加大会的干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报名南下。

我所在的夏津县十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建国会（抗联）主任和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都踊跃报名。我当时是夏津县五区的区委书记，参加会议的干部26人，有25人报名南下，只有一名副区长王振升同志，因已50多岁，又有病我劝他不要报名，他讲：我为了不在南下路上给你们增加麻烦，就不报了！三天的干部大会圆满地完成了组织南下干部的任务，干部们都回区愉快地过春节，听候确定南下或留下的通知。县委和区委书记留下继续开会，根据上级分配的南下干部名额，再根据干部的具体条件和组成南下县区班子的需要，确定南下干部名单。为了保证南下干部的质量和加强南下干部的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和区委书记、区长都是南下县区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

1949年2月下旬，南下干部很快集中到县，经地委批准迅速建立了南下县区和县委、县政府的部、科、局领导班子，南下地委的领导班子经冀南区党委批准也很快建立起来了，

冀南一地委（临清地委）南下的各县干部和二地委（夏津地委）的各县干部，都于1949年2月下旬集中到地委所在地，组织学习和进行县区部、科、局的组建工作。区以区为单位编一个班，县里的部、科、局根据人数多少，以一个单位为一个班或几个单位合编一个班，由区和部、科、局的主要领导任班长和副班长。

（二）

1949年3月初，冀南全区的南下干部根据区党委的决定，以地委为单位步行到区党委所在地的威县城西方家营一带村庄住下进行整编，学习政治和军事训练。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冀南组成1个南下区党委、6个地委，每个地委组成5个县，每个县组成6至7个区。

冀南南下区党委的主要成员是：

区党委书记 王任重

组织部长 郭 森

宣传部长 高元贵

秘书长 韩宁夫

冀南区党委原有临清、夏津、肥乡、南宫、衡水5个地委，组成冀南南下一、二、三、四、五5个地委，每个地委组织六个县级建制南下。华北局指示冀南组织6个地委南下，这样区党委又从直属机关和各地委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地委机关，从5个地委各抽调一个县成建制的干部队伍组成六地委5个县的建制。调到六地委的5个县是：一地委的冠县，二地委的高唐，三地委的大名、广平、鸡泽三个县组成一个县的建制，四地委的威县，五地委的任县和冀县。六地委主要领导成员是：冀南行署民政处长王含馥同志任地委书记，五地委的宣传部长王浩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冀南武委会的王东才同志任地委组织部长，冠县县委

书记苏刚同志任地委宣传部长，邯郸县委书记白连成同志任地委社会部长，冀南行署的农林处长李夫全同志任专员。

冀南南下一地委（即临清地委）的主要成员是：

地委书记	郭清文
副书记	杨新一
组织部长	阎跃华（因病未能南下）
专员	梁向明
分区司令员	孙洪
分区政委	杨新一（兼）
政治部主任	刘洪源（原清平县委书记）
副参谋长	齐钦

宣传部长、社会部长和秘书长没有配齐。

冀南南下二地委（即夏津地委）的主要领导成员是：

地委书记	周惠（原夏津地委书记）
------	-------------

- 副 书 记 乔晓光
- 组 织 部 长 纪照清（原恩县县委书记）
- 宣 传 部 长 芦清云（原高唐县县委书记）
- 社 会 部 长 杜一夫（原夏津公署公安局长）
- 秘 书 长 赵长春（原故城县委书记）
- 专 员 赵墨轩（原夏津县长）
- 分 区 司 令 员 田厚义（原夏津分区副司令员）
- 分 区 政 委 周 惠（兼）
- 政 治 部 主 任 赵立春（原清河县委书记）

根据冀南南下区党委的决定，南下干部全部集中到威县方家营一带农村驻扎，并实行军事化的建制。地委为大队（相当军分区），县为

中队（相当团），区和县直机关的部、科、局为小队原则上一个区为一个班，县直机关部、科、局根据人数多少，一个单位编一个班或几个单位合编一个班。大队长由专员或分区司令员担任，政委由地委书记担任，政治部主任由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担任，参谋长由社会部长或分区参谋长担任。中队长由县长担任，政治指导员由县委书记担任。班长由区和部科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担任，每个大队（地委）有干部和勤杂人员700人左右，每个中队（县）有100人左右，每个班有15人左右，每个大队有5个县编为5个中队，地直机关编为一个直属中队。大队按冀南5个地委的顺序，称为冀南南下一、二、三、四、五大队，新增加的六地委称为六大队。从1949年3月初至4月份，在威县方家营一带进行军事训练和行军中的防空演习，学习和生活都是军事化，但广大南下干部

和所有人员的情绪都是十分高涨的。1949年4月初，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在威县方家营举行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冀南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和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薛迅同志，冀南行署副主任范若一同志，分别代表冀南南下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讲了话，对南下干部给予了很大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南下到解放区完成接管工作的胜利信心。

(三)

1949年4月4日，冀南南下干部和勤杂人员4000多人的队伍，在冀南南下区党委的统一安排下，以大队为单位从威县方家营驻地出发，规定每个同志的行装不得超过二十市斤，轻装步行，每天行军60至80华里。在行军中有的同志脚上打了水泡也不叫苦，特别是一些女同志走不动时，大家互相帮助，争着替她们背

背包和行李。4月上旬北方的气候还是比较冷的，为了防备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们选择在夜间凌晨渡过黄河，尽管深夜的风吹得很凉，但却没有叫冷的。在濮阳以南乘坐木船顺利地渡过了黄河。经过8天的行军到达了区党委指定的河南开封以南附近村庄驻地。

我们于1949年4月12日到达驻地后，冀南区党委组织全体南下干部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并组织学习党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南下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冀南南下干部原确定去江苏和浙江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到达开封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冀南的南下干部，一部分到湖北，大部分到湖南。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除向广大干部和其他人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冀南南下的六个地委中，冀南五地委原建制的全体干

部和区党委机关以及六地委的一部分人员600多人，由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区党委秘书长韩宁夫同志，区党委宣传部长高元贵同志以及苏刚、韩克华同志带领到湖北省新解放区工作。冀南南下一、二、三、四、六地委共有3400多人由区党委副书记乔晓光同志，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同志（八月到湖南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带领到湖南进行接管。这时确定到湖南的五个地委，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根据中南局和湖南南下省委的指示，冀南南下六地委撤销，从冀南五个地委各抽调一个县建制的南下干部，还是回到原所在的南下地委。冠县回到了冀南南下一地委，高唐回到了二地委。大名、鸡泽、广平的干部回到了三地委。任县、冀县和威县回到了四地委。1949年5月下旬至6月初，湖南南下省委确定，冀南南下一地委的冠县、武训、清平、临清、邱县、馆

陶、莘县、元朝八个县和三地委的曲周、永年、魏县、成安四个县共1400多人为湖南省益阳地委，到湖南省益阳地区的湘乡、安化、沅江、宁乡、汉寿、益阳六个县进行接管工作。这时益阳地委仍是临清地委为基础建成的，地委书记朱效成（冀南南下三地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兼专员郭清文、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新一，地委宣传部长秦雨屏（冀南南下区党委调来），地委社会部长杜一夫（南下二地委社会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万达（三地委宣传部长），南下一分区司令员孙洪同志改任为益阳军分区副政委，分区司令员为黄林（二野调来），分区政委由朱孝成同志兼任。地委委员、南下专员梁向明改任湖南益阳地区汉寿县县委书记，南下三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委员李哲改任为沅江县县委书记。南下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刘洪源改任湘乡县委书记，冀

南南下二、四地委的全部县和三地委的鸡泽、大名、广平三个县，六地委的任县、冀县两个县共有1700多人作为湖南省常德地委。到湖南常德地区的常德县，南县、华容、桃源、安乡、慈利、澧县、石门、临澧、津市十个县市进行接管。常德地委书记由冀南南下区党委副书记齐晓光同志担任，南下六地委副书记王浩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六地委书记王含馥同志任专员，孙云英同志任副专员，柴保中同志任地委组织部长，王东才任副部长（地委委员），史伦同志任地委宣传部长。赵玉同志任社会部长，赵长春同志任地委秘书长，冀南南下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纪照青同志改任南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栗江川同志任华容县委书记，南下二地委宣传部长芦青云同志任桃源县委书记。分区政治部主任赵立春同志任澧县县委书记，南下二分区司令员田厚义同志任常德分区司令员。

乔晓光同志兼任分区政委，由六地委社会部长调邵阳地委任组织部长的白连成带领肥乡、邯郸、成安三个县的干部300多人到邵阳地委的新化，武岗工作。1949年5月底，经过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和稳定了南下干部的情绪。1949年6月初，完成上述任务后，南下到湖北的干部已进入到新的解放区开展工作。确定到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干部，由于湖南常德地区解放较早，他们由开封乘车到南京，由南京乘船经长江过湖北于七月中下旬先后到达常德地区所属各县、市。南下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和益阳地区的干部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于六月中旬从开封乘火车到达武汉待命。我们在武汉住在汉阳进行学习和休整。在此期间地委朱书记调动工作，地委书记由冀南南下的二地委书记周惠同志担任，在武汉休整

期间，除学习党的政策，还进一步了解了湖南的情况，湖南省在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率领国民党官兵于1949年8月上旬宣布起义后，在我人民解放军大反攻情况下，实现了湖南和平解放。我们南下湖南益阳地区的全体干部，在地委的统一安排指挥下于1949年8月9日从武汉分乘六只船（当时铁路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已中断）沿长江洞庭湖和资江，经过六个日夜于1949年8月14日下午到达了地委专署所在地益阳市。船刚停靠在资江的岸边，便受到了益阳市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地委行署机关住在益阳市学门口的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的督察专员公署。到益阳地区各县的干部分别住在益阳市的豫章中学和祠堂。由于考虑到南下女干部的具体情况以及刚到新的解放区，还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冀南南下区党委将南下的女干部编成两个中队留在开封学习待命。南下湖

南的女干部于1949年11月到达湖南益阳地委所在地后，由各县派人把她们接回工作单位。

(四)

益阳地委到达益阳之后，立即组织当地地下党员，向南下的干部介绍情况，以便做好接管工作和开展新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冀南南下到益阳原临清地委（即一地委）、肥乡地委（即三地委）的南下干部，经益阳地委安排工作之后，去各县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8月下旬先后到达工作的所在县区。由县委书记刘洪源、县长崔强带领冠县、莘县、邱县的干部150多名到达湘乡县进行接管。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李瑞山、县长张纪元带领元朝、馆陶县的干部150多人到达宁乡接管。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梁向明、县长刘亚南带领临清、永年县的150多名干部到汉寿县进行接管。由地

委委员、县委书记李哲、县长侯鸿业带领临清、清平县的140多名干部到沅江县进行接管。由县委书记王俊臣、县长曾广成带领的武训（堂邑）和馆陶、清平县的一部分干部共140多人到安化县进行接管，由县委书记张力耕、县长董早冬带领的曲周、魏县150多名干部到益阳县接管。因为湖南是和平解放，各县接管工作很快完成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健全了县、区党的组织和政权。按照政策妥善处理和安排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为进一步全面开展新区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的统一部署，益阳地委在完成接管工作之后，立即开展了以下四项工作。

第一，进行剿匪，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以巩固新的解放区，利于解放军南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

第二，利用旧的保甲制度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开展借粮工作。主要是向大户（即地主、富农）进行借粮，以保证解放军南进的需要。

第三，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解除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给群众带来的顾虑，并在回乡学生中发现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工作，以扩大干部队伍，满足工作的需要。当时南下干部每个区只有15人左右，一个区有10多万人口，湖南多为山丘地带，干部非常缺乏。根据这一情况，益阳地委于1949年9月举办了益阳干部学校。由地委书记周惠同志兼任校长，由南下的临清县委书记张风彩同志任副校长。在地下党（国民党统治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招收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1000多名。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分到县区工作，这对当时新区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1950年初，立即开展发动群众，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政权，建立乡农会。开展减租减息退押和反霸的斗争，经过斗争使恶霸地主退出了稻谷，分给了贫下中农，解决了青黄不接的粮荒问题。广大农民情绪很高，主动要求废除保甲长制度，民主选举人民的乡长（当时的乡相当北方的村）。纷纷要求建立农会、妇女会的群众组织。这给1950年秋冬进行土改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益阳地区在开展新区的各项工作中，都做得比较好，曾多次受到省委书记黄克诚、王首道、金明等领导同志的赞扬。

当然，在革命的征途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斗争就要有牺牲，1949年12月国民党的残余武装袭击了安化县东平区的区委会和区政府。从武训县南下的区委书记韩侯等十多位同

志在敌人的包围中壮烈牺牲。1950年元月国民党的武装匪徒在夜间袭击了桃源县桃花源区委会区政府。从夏津县南下的区委书记张秀江，区委副书记张高峰、区长万昌、区武委会主任李印广等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韩侯、张秀江等同志，当时都是20多岁的青年，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党培养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有的在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中，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益阳地委副书记杨新一同志，从冀南临清带领一地委的800多名干部，到达湖南益阳地区后，在战争还未平息的环境中，带病常下到基层总结开展新区的工作经验，因患脑溢血于1951年6月18日早8时逝世，杨新一同志逝世时只有35岁。至今回忆起为革命牺牲的这些在湖南工作的同志，便使我深深怀念他们。1983年春节期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湖南省直、部、委、厅、局党员领

导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曾这样讲过“北方的同志南下到湖南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当中有的为了革命事业牺牲在湖南的土地上。现在在世的年纪也老了，我是湖南人，我代表湖南的人民向南下的同志表示感谢！”这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些南下的同志，永远不能忘记培养我们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培育我们并使我们毫无顾虑南下的是冀南这块土地，是这块土地上有着高度觉悟的人民对我们的大力支援，我们应当永远感谢中国共产党，永远感谢我们家乡——冀南的人民！

说明：

写此稿前走访了冀南一地委的南下的孙洪，康政，陈书溇，迟修芳，徐万夫，刘云桥同志，二地委的徐敬民同志等。南下前我是在夏津地委（即二地委）工作。1949年3月调六

地委南下，1949年5月在河南开封进行休整时，撤销六地委后，调我到一地委，南下到湖南益阳地委机关工作。南下途中我曾在二地委、六地委、一地委，三个地委工作过。在六地委曾任军事科长，到达湖南益阳地区后，在益阳地委机关工作，虽接触各方面的情况较多，其中错误之处仍会有的，请冀南一起南下的同志指正。

赵 畅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

两战时期冠县的敌祸与党的 经济政策

张怀轩整理

冠县是建党较早的老区之一，在抗日战争元始之前已经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冠县的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群众，建设抗日政权，开展抗日活动，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夺取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日寇的残酷扫荡

日寇对冠县的残酷扫荡，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进入更为严重的阶段。二年內，推行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以所谓“反共”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对冠县游击区

和接敌区着重封锁蚕食，建立伪政权，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先后在冠堂，冠馆公路和根据地周围比较重要的村镇安据点、修碉堡。1940年在东古城、北么庄、王庄安了据点；1941年耿儿庄、二十里铺、马玉、八里庄、提固、赵固、贾镇、西庄，先后安了据点；1942年，城东三里庄、十里铺、王庄、烟庄、张货营、唐固、铺尚、城北八里庄、城北三里庄、贾村、班庄等又安上了据点或炮楼。截止1942年底，敌人已在全县八个区，南北90余华里的范围内，20多万人口中安了28个据点和30多个炮楼。敌人的扫荡日趋频繁，花样和方式也日趋增多。开始由突击式的进攻，转变为“清剿”“驻剿”、“扫荡”，后又改为“铁壁合围”，以至到丧心病狂地制造“无人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从1938年到1940年，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

的大规模扫荡计有数十次，尤其对桑阿镇陈贯庄、曹里村、刘村一带的扫荡更为疯狂，每次都出动兵力一两千人，有时还配有汽车、坦克等重型装备。1940年5月的1、3、5、7、9日，莘、冠、堂三县敌人对桑阿镇周围村庄连续发动五次大扫荡。

从1940年到1944年，敌伪顽杂互相勾结，昼夜突击进行的大小扫荡总计1500余次。大的合围7次，其中冠南3次、冠北4次。1942年合围王史村，连续火烧3次，烧房360间，18户被烧光，抢走耕牛70头，毒打群众30人。

1943年3月11日，敌人集结了冠、堂、莘、邱等13县的日伪军对孔村一带进行了疯狂围攻。

1943年6月10日，冠、馆、邱、聊、阳谷寿张、大名、南乐等县之敌，共集合15400余人，分十路向我白塔集及其以南的前、后李赵庄进

行合击，包围圈达14公里，最后将被围困的群众赶至后李赵庄，把25名群众残杀在一口井内，制造了极为骇人听闻的血水井事件。

白塔集在抗日战争开始时，计有369户，1575人，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减少246人，其中被屠杀25人，敌俘走4人，外出谋生83人，敌祸天灾饿死者134人，被敌人监禁拷打234人。

齐子修和无人区

齐子修原系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1937年秋，在随溃军南退中途逃窜，带着60余名士兵借抗日为名，在李辛村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1938年网罗1000余人，被范筑先编为第三支队。后来他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坐视日寇围攻聊城。聊城失守后，他占据了茌、博、堂、聊等地，到处抓丁、烧杀、抢

掠、奸淫，不断帮助日寇屠杀抗日军民。

1939年秋末，齐部侵入冠县东北的韩路、张八寨、石家砦、王羨等村，并以此为大本营向我抗日根据地李辛村、葛辛村进攻。

1940年，齐部的九旅邵吉盛率部占据了冠县东部，在原堂邑县的李海子等村安设了据点。

齐子修的第七旅即簿光三旅，于1942年2月14日率4000人窜据桑阿镇，并在轧庄、野场、凤庄三个村子修起围砦，四处抢劫、烧杀，把附近的玉庄、吕庄、油房、阎二庄、相里几个茉莉营，潘庄、谢海、梁庄、大花园头、陈贯庄、朵庄、胡町等村的粮食、衣物、牲畜、农具等全部抢走，房屋被拆除，使桑阿镇周围变成了荒无人烟的无人区。

齐匪是地地道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桑阿镇盘踞年余，死在其屠刀下的老百姓有

二百余人。经常在深夜活埋人，每次不下三、五个。

1942年，齐匪侵占茉莉营，把该村抢劫一空，接着安了据点，吃、烧全由三个茉莉营和大柳邵、邢柳邵、郭柳邵供给。全村1200间房子被拆烧了935间，102头牲畜，有的被牵走，有的被吃掉，要钱、要粮、要东西，人民无力交纳，立即受到扣押、拷打。三个茉莉营原有943人，饿死112人，被抓走失踪的248人，死绝了4户，逃荒的有460人，三村仅剩下12人坐以待毙。他们在吃光树叶以后，以树皮，麦秸果腹，随时随地倒于沟壑，无人掩埋。大花园头村共90多户，400余人被迫逃亡的90%以上，被抓壮丁的12人，其中饿死6人，赎回6人；32名妇女为了活命改嫁他乡；6个不满14岁的女孩被父母卖掉，换了粮食；14个正在吃奶的婴儿被父母抛弃；幸存的青年妇女二年內

都饿断了月经。全村共饿死94口，死绝12户。赵金栋家3口人，赵金舍家5口人，刘学铸家8口人，全部饿死。烟庄共有267户，饿死104人，有24个女孩送了人，40名妇女改嫁，全家出逃的有43户，85人，半逃荒的56户，117人，其中有8人死活不明。桑阿镇无人区的荒凉景象是十分可怕的，开始是吃树叶、树皮、后来掘鼠罗雀……最后几十里的农村都望断炊烟了。遍地蓬蒿，村无树木，路无行人，狐兔满街，有的住在灶坑或坑洞里，人的生命已微弱到极点，勉强行动的人，个个腊黄脸色，脖长，大眼球凸出，细脚伶仃，一阵风就可吹倒，老少走路不离拐棍，一步挪不了半尺。有的为了在少皮无叶的树下利用稀疏的阴影养一下气力，两眼一合就昏昏睡去，再也不会醒来；有的一步趔趄拌个跟头就离开了人间。那时在草丛中，房角里，在井边，路旁到处都可

以发现饿死的尸体。有的人饿死数日，没人掩埋；有的到自己无产可变的时侯，就把已逃荒在外的邻居家的房子也卖了。烟庄双目失明的夏伍德，饿得无法，只求速死，拿起镰刀想割断自己的喉咙，可是他自己的手只能割到一半就再也割不动了，他半死半活地被人拖到野外，天黑后，被饿红了眼睛的张延禄拖回来，剥了煮在锅里。张连德的六个月的婴儿因死后未埋也被人剥着吃了。

1943年全县因天灾人祸共死亡21000余人。仅齐子修匪部造成的无人区、32个自然村就死去11000人。

在严重的灾害下，竟有不少的地富分子乘人之危，把大灾荒当成巧取豪夺的大好时机。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江苏、河南，也有的来自各县各地，用一斗谷子、几斤红薯，把一块块好地买在手里。马砦伪乡长侯发雨一次廉价买

200多亩，地主侯安征一次买了100多亩。烟庄一村就卖给河南地主230亩。有人把土地卖光了最后仍活活饿死，如烟庄张延祿全家21口人，21亩地卖光后全家饿死。

党的阶级政策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按照战争体制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

1、实行合理负担。从实际情况出发，按土地的质量提高农业的税务。按单产一市石谷子为一亩，按土质好坏和历年来的产量折算评定。产量高，土质好的土地可评为一亩一分直至一亩五分；村边、路头、沙碱地按历年实际产量可评为0.9亩至0.1亩。每人平均土地可占有一标准亩。一亩以下者不出公粮，一人合一

标准亩以上者出公粮十分之一，二亩以上者出公粮十分之二，以此递增。每人均合11标准亩以上者，所产粮食基本都要交纳为公粮。这一项政策对实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要求，对于实事求是的调动人力物力用于抗战救亡是非常有利的。

2、减租减息，增资增税。抗日战争初期，冠县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北满蔡宋家地主占地15顷。西张庄村共有土地2500亩，光王老万家就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六十，而且都是平平整整的好地。田庄地主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土地占全村的百分之二十五还多，穷人平均占地只一亩八分。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对广大羣众继续进行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其主要形式有两类三种：

甲、雇工剥削：长工农活全把式固定年

薪，一般三、四十元，二、三十元，童工年薪只十元左右，有的家里妇女还得打里工，总之，一个人的收入仅顾一个人的吃穿，而不能养活另一人。

乙、对佃农的剥削分成二种形式，一种是死租，叫作大种地，这种租种形式租数较为固定，生产资料概不负担，收成好了，地主一年照规定的租额收租，租额不一，一般为一斗麦二斗秋，另外交柴年60斤。另一种叫活租，也叫活种地或小种地，办法是：地主出部分生产资料，如种子、牲口、肥料等，农民接收成分粮，通常为三、七，二、八或一、九分，佃农只要百分之三十、二十或十，其柴草多归地主，瓜菜则分吃。

以上两类三种剥削形式是较为普遍的。有的地主不按约定的租额收租，还要进行种种超额超约定的剥削，如，小亩出租，大斗收粮，

交租以外打零工，给地主家担水，喂牲口，修房、洗衣、扫院、锄草、看孩子……以及地主家婚丧之事佃户还要帮工，送礼等等，简直压得雇佃农喘不过气来。针对这种繁重的剥削情况，我党于1939年初，提出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口号。1940年首先在二区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的斗争，1944年全面减租减息，改善了雇农生活。1945年冬初，党对“减租减息，增资增佃”以及合理负担政策作了部分修改。总之，几年的双增双减政策，对消弱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剥削势力，改善佃农的生活水平，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使广大群众对党和抗日政府更加拥护和热爱，并积极地参军参战，拥军支前，1943年在双减双增之后，三区一次参军就有100余人。群众对军属的照

顾非常热心周到，村给他们盖房，儿童给他们拾柴，民兵给他们担水干活等。王六庄王本元参军后，家里有一个小孩无人照管，50多岁的妇救会长亲自照看抚养，还给他们募捐还债等。这都说明了政策得力，唤起了群众的极大热情。

3、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冠县党和政府在“双增双减”取得胜利，有限制地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和广大人民的要求，1943年秋后展开了赎地运动，规定的原则大致是：

（1）贫农卖给地主、富农、贪污者、汉奸的土地一律赎回；地主、富农、汉奸、贪污者卖给贫农的土地则一律不准赎。

（2）中、贫农之间买卖的土地根据情况（主要是根据每人土地的平均数）予以解决，一般中农与中农、贫农与贫农之间，卖契改为

当契，贫农卖给中农的土地则赎一半当一半，中农卖给贫农的土地赎一半或三分之一。

(3) 因债务关系而转移的土地也要赎，时间从民国元年开始。

由于政策得宜，在党和各村“赎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对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到1944年冬天终于完成了这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使众多的因灾荒和债务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

(4) 借粮运动。因为在荒乱之年，不法的地主豪绅利用敌伪势力和大灾荒机会，大量敲诈勒索人民的财产和粮食，他们屯积居奇，巧取豪夺，廉价买粮食，然后高价出售，使粮食紧张问题加剧。根据外地经验，我党发动群众积极展开了借粮运动。一方面，对借粮对象分类排队，摸清底子，实事求是做到心中有数，对

每户提出的借粮数目，说明道理，以理服人。一方面发动群众对被借粮对象先礼后兵，对开明的给予表扬，顽固的则要说理斗争。当时我永智县四区先从野庄、义村两村试点作起，共借出粮十万余斤，缓和了粮食紧张局势，支持了群众生产自救。

（5）开展抗灾、渡荒和大生产运动。经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天灾敌祸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恶化，社会经济极端衰弱，使广大群众摆脱困境，从而战胜敌人，是对我党的考验。事实表明，我们党贯彻一系列救灾渡荒的政策是十分成功的。

救灾工作一方面是减免灾区的应征粮款，实行大规模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利用各种可能增加财富，使救灾渡荒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1943年，因本县受灾严重，地区的公粮完

全减免。1944年的夏征，也因灾荒刚过，人民生活水平尚未完全恢复，也进行了较大的减免：重灾区每人一亩基本不拿公粮外，另外还有二亩负担也不纳公粮。这样每人有三——四亩地不纳公粮。绝大多数农民春季公粮都被减免了。

政府不仅对灾区不征公粮，而且利用多种形式发放了大批救济性粮款。据统计，1944年春天，第一次发放各种贷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三十多元。第二次贷款三百九十三万七千一百元，另外还有救济款五万二千多元。同时为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政府贵买贱卖麦子十五万斤，每斤低于市价三分，并以高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收买了群众的高粱谷子等粗粮。

公粮的减免和社会救济，救灾渡荒，较有成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全国范围内开

展起羣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党和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发动羣众，人人制订生产计划，找生产门路，领导人民打井修渠，抢种补种，锄草保苗，扩大种植面积，力图不荒一亩地，不空一茬苗，以弥补连年干旱造成生产上的损失。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羣众直接组织人民战胜灾荒。1944年夏末秋初开展了六次捕蝗活动，共捕蝗虫1350万斤。蝗虫多得遮天蔽地，煞是惊人。烟庄村那年共有土地3700亩，种了2000亩谷子。蝗虫飞来时1700亩被吃得精光，其余300亩有一半叶子被吃光，剩下70多亩，还有点稀疏的叶子，秋后每亩谷子只收45斤。第二年的螞蝗也十分可怕，一棵谷子有25——30多个。有的农民一夜灭掉螞蝗一口袋半。那年蝗灾过后，又捕捉蝼蛄，共捕370万余斤。为了鼓励羣众及时扑灭虫害，还制定了奖励办法，每捕捉5至6斤，发1斤粮食。

在生产救灾中，为支持人民重建家园，发展农村副业、手工业，如淋盐、打油、运输、纺织等，特别是群众性的纺织运动，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府共贷棉花9万斤。对副业手工业的生产，政府不仅发给原料，还发给生活费，这样既能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也保证军用供应。

为将大生产运动尽快推向高潮，党和政府还拟定了“耕三余一”和深耕细作的生产措施，发放贷款贷种，以解决群众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仅1944年春播时，全县贷农具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多元，贷耕牛款九十万元，秋季为种麦子，贷麦种18万斤，贷耕牛90头。

在当时劳力、畜力缺乏的情况下，随着自救运动的发展，党和政府及时注意了劳动互助组织，起初只限于农业范围，后来逐步扩展到副业和手工业，其形式有长期，短期，流动，

固定等几种，总的原则是自愿结合，互助互利或等价交换。明显的好处就是能灵活地组织换工，拨工调济劳力，这样的劳动互助组织在1944年春天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仅二、三、四、六这四个区统计已有879个，参加男女7334人。互助组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只一个六区的互助组那一年就春翻耕地21082亩，它在我县战胜自然灾害，摆脱饥荒困境，取得1944年和1945年两年的大丰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组织发动的作用，还成为以后农民从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的开瑞，成了以后农业合作社的萌芽。

总之，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在那个时期里是非常正确和极为重要的，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经济的发展，使全县20多万人民在天灾敌祸两种祸害造成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克服了严重困难，渡过

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为进一步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物质的保证。

6 土地改革

经过减租减息，增资减佃，反贪污，查黑地，及赎地斗争，封建势力已受到沉重打击，尤其经过1944年反奸反霸清算斗争，打垮了部分地主，农民已获得了部分土地。但运动仍未深入，也不平衡，在原六、八区（新区）封建势力似占上风。1946年县委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又进一步在本县老区、半老区开展了“查减”运动。消灭了赤贫，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物，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查减运动根据一、二、三、四、五区131个村庄统计，共斗争地主797户，没收或征收土地11899亩。三区和四区中有几个村庄，斗争地主24户，富农40户，没收或征收土地2019

亩。区乡之间土地问题也基本得到拉平。为了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根本消灭封建剥削的经济制度，根据1947年9月中央的《土地法大纲》和1948年2月22日《中央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全县又召开了土地会议。1948年2月进行了“土地改革”，历时不到半年的土改运动，彻底打垮了地主，人民获得了大翻身，广大农民根据“大坑多填，小坑小填，无坑不填”的分配方法得到了大体上相等的土地、房屋、财产。据统计，全县489户地主、987户富农，2140户下降户和富裕户被没收、征收和抽动土地32403亩，有9721户贫雇农得到填补，平均每户填补3.577亩，共9487户得到了浮财和房屋7389间。如两提固贫农28户，107人，共得土地360亩，房57间，牲畜5头。小郭寨冯行贫农83户，297人，获得土地278亩，房615间，牲畜70头，使绝大部分

贫农上升为中农，各阶层比例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改革的完成，结束了几千年统治人民的封建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取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冠堂边”的借粮减息斗争

许世平 李荫川

“冠堂边”是指冠堂公路以北、冠县堂邑两县交界的部分地区。冠堂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1943年秋，与日伪地主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借粮减息斗争。

由于敌人长达六年之久的盘踞骚扰，加上一年来的大旱，1943年夏季颗粒未收，使冠堂边地区的大片村庄，田园荒芜，造成了罕见的无人区。村里残垣破壁、断炊少烟，屋前屋后长满一人高的荒草。狐狸、野兔在村院乱窜，受灾的群众下关东，逃河南，被迫卖儿卖女，使许多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冠北六区荆家楼村，仅剩两户，其余不是饿死，就是外出讨

饭；王羨村原有1700多人，讨荒外出和饿死的1000多人，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各村的地主老财，趁机廉价收买土地，大肆放高利贷。他们用一二斗谷子，就能从穷人手里买到一亩好地，同时用极其苛刻的条件卡借粮的穷苦老百姓。穷人要用田产文书做抵押，要有富裕的亲友作保证，免得将来饿死欠了他们的粮债。规定春天借一斗谷子，夏季还三斗小麦。1942年秋因天旱、没有种上小麦，1943年继续大旱，直到农历7月初才下了透雨，农民没有牲畜，只得拖着骨瘦如柴的身躯用锹掘，人力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种上绿豆。等秋天收了绿豆种小麦，麦种奇缺，价格暴涨，三斗绿豆才能换上一斗小麦。这样，春天借的一斗谷子，这时就要用九斗绿豆来偿还。广大群众整天愁眉苦脸，一些地主，不管穷人死活，三番五次催债，逼债。广大农民苦

不堪言。

针对上述情况，冠堂边县委书记肖平同志及时召开了县委会，指出解决人民的疾苦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自救，开展减租减息，决定由县抗联具体领导这场斗争。参加的领导同志有县抗联主任鲍廷干，县委组织部长念辛涛，六区抗联主任许世平。减息的重点是借粮当中的高利贷，并把王羨村做为全县减租减息的典型来抓。抗日政府规定，每借一斗粮，年息三分，即借贷一斗粮，一年还本息一斗三升。县抗联组织县区干部，首先深入到王羨村进行宣传工作，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依靠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及各种群众团体，同地主进行当面交涉，要求按新规定还债。

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减息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不少人思想有顾虑。有的人认为，

借贷粮食时，找保人，托朋友，是我们主动找的人家，现在按政府的政策还债，不好开口；有的人怕接新政策还债，伤了感情，得罪了他们，以后有了困难，堵死了这条路；还有的人怕变天，担心共产党、人民政府站不住脚，敌人再打来报复。针对群众的这些顾虑，县抗联决定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向广大群众说明，大反攻已经开始，苏联打败了希特勒，日本鬼子也快灭亡了。八路军，新四军不断打胜仗，冠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敌占区大都被开辟为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及其汉奸已被我军打得龟缩在县城及封锁线的几个孤立据点里，只要我抗日军民团结起来，坚决同敌人斗争，我们一定会胜利，敌人一定会灭亡。并进一步说明，地主放高利贷，使许多人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哪里还有亲戚朋友的情义呢？减租减息是抗日

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抗日人民政府是有能力有办法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的。通过以上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解除了思想顾虑，增强了抗日减租减息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王羨村借粮的群众，在农会主任刘彩云、刘天目同志的带领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在1943年10月的一天下午，100多名群众整队来到邓官屯村，面对面地与地主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为给群众撑腰，县抗联主任鲍廷干，组织部长念辛涛，六区抗联主任许世平带领县区干部一块参加。他们首先把各户放债的地主集合起来，宣布了政府的减租减息规定，指出放高利贷是不道德的非法行为，号召他们执行党和政府的法令，自觉的减租，然后，借粮农民分头按政府的规定，进行了还债。有的地主要花招，假仁慈，说什么可以缓至来年再还，妄图过了

风头，照原数要租。抗日政府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让借贷双方，按政府的规定，当场重新立了字据，明年不得多要。

王羨村农民借粮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使其他村倍受鼓舞，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个以减租减息为重点的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在冠北其他各个村庄迅猛地开展起来。



崔竹宣传略

赵长聚 整理

崔竹宣，原名克勋。男，中农出身，职员成份，冠县桑阿镇野场村人。生于1895年旧

历11月27日，卒于1980年5月9日，享年85岁。

生前曾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四届河北省委员会委员，邯郸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邯郸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第十八专

区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十八专署参议室主任参议，冀南第七专署参议室主任参议，专署垦殖局局长，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冀南第一专署参议室主任参议，建设科长，邯郸专署卫生科长，邯郸市副市长，邯郸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崔竹宣1904年至1911年在家读私塾，1912年8月至1913年7月，在冠县乙种实业学校求学，1915年12月，在冠县高级小学毕业，1921年2月，在省立师范附设专科班毕业，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全国暴发了“五四”运动，崔竹宣积极投身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除参加校内的罢课、游行外，还两次到冠县、堂邑县、馆陶县等地做救国宣传工作。

崔竹宣于济南省立师范附设专科班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8月至1928年12月，在冠县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员。在此期间，

山东省旧政府在泰安考试招用县教育科长，他与管渡生等人前去应试，崔被录用。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在冠县政府任教育科长，1933年1月至1935年7月，在冠县县政府任第五科科长，1935年8月至1935年12月，在濮县县政府任第五科科长，1936年1月至1937年11月，在夏津县政府任教育科科长。1938年2月至1938年7月，在冠县抗日政府任教育科长，1938年10月至1939年1月，在临清四专署任教育科员，1939年2月至1941年1月，因病回家居住。他虽供职于旧政府，但不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正派廉洁，热心教育，治学严谨。据他的老同事、冠县政协常委、八十九岁的管渡生回忆说：崔竹宣在冠县旧政府任教育科科长期间，因家劳力少，孩子多，过春节有困难，让教育科会计崔羽臣帮助他借钱。会计说，咱科里的公款都在钱庄上存着，你用

多少我给你取好了，不必烦劳别人，还得拿利息。崔竹宣坚决不同意，还是通过会计向私人借的钱。管渡生还回忆道：崔竹宣在任冠县教育科长期间，对国民党的党棍、党阀贪官污吏一个不用，对有真才实学和真心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却大加重用。如他从德州特聘许效农为冠县师范讲习所的校长，陈贯三为一高校长，宋开勤为二高校长，管渡生为三高（即女子高小）校长。以上几位校长都是“白板”。由于爱国进步人士控制着学校的领导权，国民党插不进手去，所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得以发展。丹彤、许梦侠、钱洪勋等革命老干部，都是这个期间，由在校任教的共产党员何元鑫发展入党的。

崔竹宣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七七事变”前，他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公然抵制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秘书长张绍唐在教育训练班上所散布的“天下无不

是的长官”的谬论。“七七事变”后，他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真正抗日者只有八路军，领导抗日者只有共产党。”在当时的一个绅士会上明确表态：“为抗日而放大胆量，不怕任何牺牲，”断然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逃，于1941年2月投身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是年2月至7月，在晋、冀、鲁、予十八专署任救灾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至1942年1月，在晋、冀、鲁、予十八专署任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2月至1942年10月在冀南第七专署任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垦殖局局长，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除继续任救灾委员会主任外，还担任参议室主任职务，1945年2月至1945年12月，任冀南一专署建设科科长，1948年6月至1949年12月任邯郸镇建设科科长，1950年1月至1951年4月，任邯郸镇政府民政科科长，1951年5月至1955年2月，任邯郸专署卫生科

科长,1955年3月至1966年,任邯郸市副市长。

崔竹宣参加革命工作后,在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团结和带动各界人士,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一心一意干革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他的各项任务。1947年被评为冀南第一专署甲等工作模范及团结友爱模范,在冀南第一专署召开的贺模大会上,荣获第一号奖状。崔竹宣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将自己的子女送到革命队伍中。1953年12月31日,崔竹宣在自传中写到:“长子景尼,在本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次子景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三子景运任河南省南阳市百货公司经理,长孙长庚,长孙女筱黎,都在电台工作,一个在朝鲜,一个在工兵部队二十团,驻山东福山,次子媳关晶民,三子媳吴淑云,都在经济部门工作。另次女景真任华中钢铁公司大冶技工学

校人事科付科长，全家共有八名共产党员。”

解放后，崔竹宣深深懂得新政权的来之不易。他勤奋学习，忘我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艰苦奋斗，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1953年崔竹宣在自传中曾写到他任专署卫生科科长的情況：“工作中有一定成绩，如52年全国卫生模范原河北省共三个，本专（邯专）即占两个，及至张家口，山海关等地划入河北省后共六个，邯专还占全省的三分之一。53年各县一般又有了进步，发病率52年8月至11月份，7种传染病的统计较51年同期降低百分之四十，53年1月至3月20日，11种传染病较52年同期降低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死亡率则降低百分之七十六。这些都是各级领导的重视及各级卫生人员的努力与群众热烈响应的结果。”崔竹宣逝世后，邯郸市市委第一书记岳歧峰同志在悼词中说：“文化大

革命前，在他分管我市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工作中，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展我市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卫生工作中，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在灭蝇上取得了突出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我市成为无蚊蝇的卫生先进城市，至今全市人民还在赞颂崔竹宣同志的这些事绩。”

文化大革命中，崔竹宣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苦迫害，给他强加了种种罪名，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属受到株连。次子崔景清，由志愿军转业到辽宁省本溪市任工业局局长，1968年5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三子崔景运，后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副专员，但因其父问题屡受批斗。其他子女亲友也受到连累。崔竹宣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同志、

对羣众舍身保护，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信赖。

粉碎“四人帮”以后，崔竹宣任邯郸市政协副主席。他信心百倍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心政协工作，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积极贡献力量。正如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岳岐峯所评价的那样：

“崔竹宣虽然长期臥床，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渴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并勉励子女和亲友为四化和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崔竹宣经历几个时代，为寻求革命真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从一个又一个的实践中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决心投入党组织的怀抱，使自己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在1967年10月23日的一份材料中写到：“我1964年元旦正式申请入

党。我当时身列革命队伍已二十余年，年龄已达七旬，愿意更多接受党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做出贡献，心情愈切，要求入党的愿望愈不可遏。因此于元旦天不明时写好申请书，天明与刘英（当时的邯郸市市委书记）电话联系好送交刘英……元旦天未明时我把申请书写好，天明洗漱后未吃饭即找刘英面交，这样表示我对共产党的尊重，也说明我跟共产党很多年，年纪已达七旬，入党愿望愈切。”此后，崔竹宣又多次与当时的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刘英、王福祿、靳隅、张俊峯、苏其祥、张矩等同志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口头或书面多次向党组织如实地详细地汇报自己的经历及其他有关情况。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对其入党问题十分关心。当时崔竹宣向市长王福祿汇报思想情况时说：“入党是我一生的大事。”王说：“你的入党也是邯郸市的大事。”崔竹

宣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终于在他逝世前六天——1980年5月3日，由张俊峯、苏其祥介绍、经河北省委批准，实现了他一生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张矩同志说：“当党组织在医院把这一决定告诉病重卧床的崔竹宣时，崔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死可瞑目，含笑九泉。

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崔竹宣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1980年5月9日16时10分不幸逝世。他逝世后，由邯郸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同志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政协河北省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统战部等部门送了花圈。他的生前好友或同事许梦侠、杨立功、丹萍、赵健民、许世平、王笑一、黑伯理、王振凡、齐涛、高元贵、王志浩、司洛路、郝佃役、马景汉等送了花圈。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岳岐峯同志在追悼

会上致了悼词。他说：“崔竹宣同志从一个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的这种革命意志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勇于革命、寻求真理、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革命到老、改造世界观到老、不谋私利、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团结同志，努力工作的优良作风。崔竹宣同志的逝世，无疑是我们的一个损失。悼念崔竹宣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此稿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邯郸市人大、邯郸市政协、邯郸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一腔热血化宏图

——王桐春烈士的英雄事迹

冠县公安局政研室

王桐春，冠县东关人。1900年生，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我抗日联络站任联络员，1945年正月9日，壮烈牺牲。王桐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但他那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英雄业绩，一直在冠县人民中传颂。

重节气，倾向革命

王桐春童年时代读过四书五经，曾就学于冠县城内第一高级小学，接着升入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后便回到母校——城内第一高级小学

担任历史教员。

王桐春在读书期间，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旧知识分子的狭隘，保守偏见日益减少，能从历史的兴衰看清历史的潮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富有正义感，他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更切齿痛恨。

他利用担任历史教员的合法身份，对学生进行民主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满清政府的腐败，丧国辱权；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鲸蚕中国的野心，学生们大为激愤。下课后，学生气愤地走到地图前大骂日本鬼子。

王桐春不仅启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反对旧政府的剥削压迫，还旗帜鲜明地帮助进步学生，使之走向革命道路。抗战初期，他的学生霍汝清（又名王黎之，系冠县朱霍三里庄人，

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现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由组织派往冀南区学习。因其家贫苦，王桐春即慷慨解囊相助，使霍很受感动。

除霍汝清外，还有早期跟王桐春读过书后参加革命并担任了省、地级领导职务的赵健民、许梦侠、马景汉、郑光等同志。

王桐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人民惨遭蹂躏，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关头，不是只顾自家性命，苟且偷生，而是和闻一多等深明大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样，拍案而起，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之中。日寇占领冠县不久，他即主动地靠拢我党地下组织，经上级批准，参加了抗日情报站任秘密情报员，从此王桐春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而直接投入革命怀抱。

王桐春在城内公开的身份是第一高级小学教员。实际上他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利用在城

内的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为我党搜集日伪情报，送到城关三里韩村周书臣（周去世后由高善成接替）再转送白集岳济普交公安局长刘清华、南进支队武工队长兼政委刘亚东。

王桐春因幼年患病而留下后遗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尽管如此，但只要有紧急情况，他总是及时出发，跑几十里路，准时把情报送到。据王庆丰（南支武工队队员）等与王桐春有过直接接触的老同志回忆，当时，我党曾得到王桐春送出的日寇5次强化治安的情报。每次均使我党、政、军、民有准备地对付敌人的“扫荡”，大大减少了损失。

同时，王桐春对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革命的火种。有时病情加重，自身行走困难，即让两个儿子代送情报信。特别是长子王秀林，在父亲的培养下，锻炼得智勇双

全，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有一次，在送情报途中，秀林被“扫荡”的日寇围困到梁堂的扬寺地，他急中生智，背着敌人将情报塞到肛门里，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搜查，鉴于秀林的出色表现，我们的同志都啧啧称赞他为“小八路”。

秀林有四个姐姐，他是长子，在家里受到父母的宠爱。王桐春不仅自身冒着生命危险搞革命，而且让儿子跟着干，曾遭到有保守思想两位老人的非难。王桐春虽然苦口婆心多次作老人的工作，但残酷的现实始终未能使旧思想较深的老人改变偏见，致使老人怕秀林的二叔受牵连，而把王桐春一家分出来另过。

当时进步人士为我党工作没有什么报酬，尤其1942年大灾荒时期，羣众生活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王桐春又要为一家人的衣食奔波，又要父子同心同德，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畏

惧地坚持斗争，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洒热血，以身殉国

王桐春投身革命担任情报员后，就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家紧紧地贴在革命事业上。他不仅把为我党和抗日政府搜集各种情报作为己任而尽职尽责，而且还热情地去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有些事即使党没有安排他，只要认为对革命有利，也不遗余力地去完成。

抗战初期，我们的抗日区长郭凌旺同志，不幸被日寇逮捕入狱。王桐春同志听说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加之组织的力量，终于把郭营救出来。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南进支队司令部委派参谋李东，来冠县侦察敌情。王桐春亲自掩护李东，与我打入敌人内部的关系接头，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王桐春对敌人斗争十分顽强，引起了敌人

的忌恨，曾被日寇3次逮捕。

第一次被捕是1942年10月间，以通八路嫌疑的罪名，于某日晚8时许在家被日本宪兵抓去关押在警察所内。次日又将其妻徐桂芳和长子王秀林抓去，家中被抄，砸毁了家俱。敌人将其妻的手打肿，将其子的臀部打肿。经徐明芝（东关人，当时任警察所传达长）等人联合具保，其妻和长子才得释放。王桐春被关押6个多月，受尽敌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烙铁、竹枷板等酷刑。但他坚贞不屈。经保人多方担保，交上5千准备票才获释放。为筹借钱款赎身，家中被迫卖地10亩。尽管付出这样沉重代价，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敌斗争的坚强决心。出狱后立即投入革命工作，接着又发展了伪政府内部的康黄二人，为搜集敌人的情况而打入敌人心脏，对搜集敌核心机密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被捕是1943年9月，从县城东门里第一高级小学抓到伪大队部。那时王桐春秘密接到我抗日一区梁文焕区长的指示后，便千方百计地把东关街征收准备交伪军的粮食，转移到我一区抗日政府的手里，此事引起了伪投敌叛变分子征收处主任黄锡光的怀疑，便把王桐春及两个儿子秘密逮捕。经我内线康伟臣、黄秘书全力设法营救，敌人又查无实据，同时由城关辜月亭伪镇长等5个头面人物联合作保，才将王桐春父子释放。

第三次被捕于1944年11月某日晚，由于黄锡光告密被捕。后来关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这次受刑比上两次更加残酷。同时，又把他两个儿子抓去，逼迫交准备票赎身，两个儿子于年前释放。但是，王桐春虽经组织多方营救，终未能出狱。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临刑前，在狱中写了遗嘱夹到窝窝头里，偷偷地交

给送饭的伙夫（已故，当时在日本司令部做饭，东关人），转送到家中。信中教导孩子继承父业，战斗到底，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5年古历正月9日，王桐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被日寇刺死，以身殉国。时年45岁。

王桐春为着抗日救亡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先觉者，他不失为一代楷模，他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为民族捐躯的精神是高尚的，永存的，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冠县人民的心中。

（根据刘亚东、姚汝林、王秀林、王秀森等同志的回忆整理）

悼念王桐春老师
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
调寄行香子

张 怀 轩

痛失良师，民族之英。屠刀下铁骨铮铮。
国重身轻，捐躯何惊。忠魂不泯，化长虹，遨
太空。

忆我童蒙，就读县城。亲教诲，谆谆面命。
抗日军兴，鱼雁犹通。频频叮咛，“莫恋家”
“早革命”。

（原写于1945年王老师惨死噩耗之后，追
记于1983年整理县志资料之稿）。

怀念朱冠友同志

司洛路

我与冠友是1937年12月认识的。当时他在山东省第六保安区政训处的政训队当队员。我去该队后，一块活动，以后我俩一同转入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在游击队同时由战士升为副班长、班长、连队司务长，又同时入党，一块生活了半年多。

朱冠友系山东省冠县城内北街人，老家原在山东省济宁州，是他父亲在灾荒年带领全家逃到冠县的。他生于1918年9月6日，1933年在冠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1935年在冠县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曾在冠县城东五岔路村小学教书。

冠友家中贫苦，一家人靠其父开小饭馆维持生活，他勉强读完高小，无力升中学，就考入供给伙食费的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

冠友为人忠厚诚实，与同学团结友好，学习认真刻苦，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常读进步书刊，1935年在师范讲习所毕业前夕，经同学好友许梦侠介绍参加共产党。当时国难当头，日寇侵华形势紧迫，冠友爱国思想浓厚，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七七事变”后，日寇先占平津，继而占河北、山东。国民党大军南逃，县区政权溃散，小学停办，一些知识分子随后过河南逃。人心惶惶，痛感亡国之苦。当年11月间山东省第六保安区政训处派郭登之、徐茂里等政训员，到冠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冠友进一步受到鼓舞，渴望投身抗战工作。但因石洪典打进

县城，政训处撤走，后经政训员指引，冠友才去聊城参加了山东省第六保安区政训处的政训队。并随当时的保安司令兼专员范筑先将军去茌平、博平、清平等地活动，在堂邑县城北柳林镇与大杨庄之间参加了阻击日寇的战斗。

1937年12月初，我到阳谷县找到撤去的政训处，并由该处负责人徐茂里介绍，去聊城政训处，由张维翰主任派我到政训队工作。当时政训处政训队都驻专员公署内，我一到就遇见了高小的同学丹彤。由他介绍我与冠友相识。之后丹彤调阳谷政训处工作，临走时他嘱咐我，与小我五岁的冠友相互照顾。从此我俩朝夕相处，在艰苦环境中相濡以沫。一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队长刘子荣叫醒大家集合，他说当前鲁西北形势吃紧，日本侵略军已到临清、德州，为适应战斗形势，政训队要精简，办法是：第一，一部分可去驻东关的抗日游击队，第

二，如留队则要进行考试，不合格者仍需离队。当时政训队中茌平、博平人多，队长又是在平人，明显的意图是留下茌博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商量：一不回家，二不考他的试，咱们为抗日救国而来，这里不留，干脆参加抗日游击队去。次日，我俩就报了名，并由住在政训处的一个名叫廖云山的带领，去东关小学参加抗日游击队。

该队叫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叫廖云山，所以号称廖队，廖来之前，队长是老红军洪涛，当时叫洪队。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党员与民先队员为骨干，战士多数是堂邑与聊城县的青年农民，也有一部分小知识分子和地方旧军人。它是由堂邑县政训处于1937年10月改组而成的。该队成立后，在堂邑县活动了一个时间，后调聊城政训处集训。

队伍日常课目是进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操

练，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拉丁新文字，生活很紧张，队长、排长多是共产党员担任，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经济公开，伙食尚好。战士情绪饱满，精神愉快，很有点八路军的样子。当时有四、五十人枪，后发展到人枪100上下。1938年元旦前，移驻城内山东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元旦后，为了队伍的自身发展和协助抗日政权开展工作，先后调防阳谷与寿张两县。并在阳谷城西打过土匪队伍“一气水”（姓温的头头），应县长徐茂呈之请，军临城东北李庄，迫使朱庄的土顽缴纳抗日粮赋；后在寿张县掏过匪窝，还去阳谷县坡里夜搜有汉奸嫌疑的天主教堂。由于两县政府与政训处的大力支援，迅速发展到了50人枪上下，有力地协助两县抗日政权工作的开展。

这期间，在政训处工作的李荫隆与丹彤曾来看望我们，当看到我俩多日没换洗的衣裤上

生满虱子后，随即给我们两条棉裤，并给我俩每人一元钱表示慰问，对此，均有他乡遇故知的快感。

1938年春节后，队伍奉调去冠县，成立了以政训处主任张维翰为司令，老红军王幼平为政治部主任的抗日游击第十支队。队伍驻城西唐寺时人枪扩大到200多，成立了第二中队，驻城内文庙时人枪扩大到300多，成立了第三中队。此时队伍改建为营，中队改为连，廖云山调走。老红军刘智远来当营长。五月间攻打北馆陶，撵走了伪化的土匪王来贤与金甲部。此时政训处发来掷弹筒与十几挺机关枪，因此改为机枪营，队伍扩大到五六百人枪，便成立了第四连。

初到抗日游击队时，我与冠友在一个班，后因队伍扩大，我俩同时升任副班长，班长。驻冠县文庙时，同时升为连队司务长，他在—

连，我在三连，在馆陶时，他在二连，我在一连，后来我调到营部工作。

1938年春节后，队伍驻寿张县城北街旧粮仓内时，我俩同时由宣传队政治指导员陈耀贤介绍参加共产党。后在冠县文庙中由政治教导员吴新之主持，举行了我俩与冯兆年、刘泮林四人的入党仪式（不知为什么，他没说他曾在1935年入党）。

同冠友相处期间，深感他是一个积极前进的热血青年，精明、机智、勇敢、爽直，为人忠诚厚道，朴实无华，工作勤奋扎实，与战士关系密切，干部间团结友好，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我俩相处一直是很好的。

1938年6月我奉调去南宫县冀鲁豫边区省委党校学习，从此与冠友分别了。1939年6月我回冠县工作，很想会一会老战友，谁知他已牺牲了，我深为痛悼。

冠友同志牺牲于1939年6月2日，当时任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机枪营某连政治指导员，一次在冠县城南谷子头北洼里与日寇战斗中，他主动留下掩护连长带队撤退，勇敢地射击敌人，身中多处枪弹壮烈牺牲。后由其嫂赵广森同志去收殓，见他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像向敌人瞄准射击的样子。

冠友同志离开我们已四十多年了，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的理想，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已初步实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沿着党指引的改革的大道迅猛前进。

清末民初冠县城关平面示意图 及其说明

姚 汝 林

冠县城为明正德年间所建。据旧县志记载：县治旧有土城，周围五里，高二丈九尺，宽二丈。成化年间，县知事甘华修建城四门楼；正德六年，县知事倪炎建南、北关厢；嘉靖二十一年，县知事姚本筑护城堤，增建敌台（炮台）和团城，重建四门楼，甚为壮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知县刘庄修建城四门楼，又砖砌城墙南面，因疾停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县冯嘉会砖砌城墙东、北两面，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知县王照砖砌城西面。

姚本定四门名称为：东曰崇明门。南曰纯化门，西曰阜城门，北曰永安门。王照改称为：东曰延羲门。南曰丽正门，西曰驻晖门，北曰拱极门。1938年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破墙时，城墙砖上有“正德三年”、“正德四年”、“正德五年”、“正德六年”等字样，从实物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例说明

(1)、城为正方形，墙周长二千五百二十余公尺，高九公尺半有余，用砖土构筑，外砖内土，砖墙内壁上每隔一公尺突出半截砖，布满了梅花式形状，用以固土。砖墙顶每隔一公尺筑有一个长一公尺、高六十公分的砖垛，砖垛中心有十字望孔。土墙是用三合土夯实筑成，紧贴在砖墙内壁上，土墙顶宽可并行两人。

(2)、城内南北向，按三条轴线、东西

向按一条轴线布局。南城门设在西轴线南端，北城门设在东轴线北端，两门不相对应。东西门是相对应的，故有“卧牛城”之称。

(3)、据旧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县令孙健在城门上各建有两层高的门楼，楼壁上留有射击窗口，故称箭楼，也称城门楼子，崇脊四角瓦顶，脊上有鸟兽，四角各有一只风钟，钟锤下有一铁叶，风吹铁叶带动钟锤击钟，发出叮叮咚咚响声。

(4)、据旧县志记载：明嘉庆年间县令姚本，在城四角至城门楼，每距百多公尺筑有炮台，共计十二座，台上有铁铸火炮，炮身长1米35公分左右，炮口外径20公分，内径10公分，人称牛腿喻。

(5)、城墙外有围城河，也叫护城河，清光绪年间，县令丁兆德在河两岸植柳，民国二十年，树干已二、三人合抱了，河内旱季无

水。

(6)、四门外护城河上建有吊桥，桥根在河内侧岸上。后改为固定桥，在桥根建有栅栏门，为城防保障之一。

(7)、东、南、北三关厢尽头，各建有栅栏门，为城防又一保障。城东南角外，约五百公尺处，建有团城，占地约四万平方公尺，又称清泉书院。战时是城防重要堡垒，平时是藏书的地方，可以说是平战结合的构筑物，是全城第二制高点，是明嘉靖年间县令姚本建造的。据传说毁于太平天国军。

(8)、城四门内左边，均建有守门兵丁房，亦称门丁房，是十多平方公尺的平房。建国后，市民建成住宅。

(9)、南门内建有大影壁。“七七”事变，国民党军南退，影壁成为炮车通过的障碍，故被拆除。

(10)、壁北路东是老盐店，是官办卖海盐的店铺，后倒闭，房产转卖给私人所有。

(11)、店北建有石牌坊，是明朝一位将军建立的。“七七”事变，国民党军南退，阻碍炮车通行，将其拆除。

(12)、坊北路东建有三班大院（快班、皂班、看班）。民初改为警察局驻地，后改为县保安大队部驻地。解放后，土改分给贫民所有。

(13)、坊北路西建有童文书馆。原产权属清真寺。民国县长吴彝辉执政，官府购用，改为县立第二初级小学。建国后改为干部宿舍。

(14)、南大街北头，西大街路北，建有鼓楼，也称古楼。崇脊歇山筒瓦顶，四角上翘，双层飞檐，脊端有鸟兽，四角有风钟，楼中央铺有八平方公尺的白色大理石，人称“汉

白玉”，故有“玉石古楼”之称。它是全城第一制高点，登楼远望，五公里内村庄景物尽收眼底。民初改为县立图书馆，又称民众教育馆。不知何时何故将大理石搬迁至关帝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将楼拆除。

(15)、楼北是旧县属大堂。据传说毁于太平天国军，成为广场，称旧大堂，仍留有几处建筑物。

(16)、大堂南建有大影壁。传说县官出告示，都贴在大影壁上。建国后城建规划，建一南北大街，将壁拆除。

(17)、壁西建有男监狱。民国及日本侵略军占据期间，都在使用。建国后拆除，建为县委，政府大院。

(18)、男狱西北紧邻，建有“狱神庙”，又称肖王庙。传说是汉丞相肖何庙，年久失修早

毀。建国后，人民政府将其旧址建为县委、政府大院。

(19)、壁东有女监狱。民国及日本侵略军占据期间，都在使用。建国后被拆除，建成公路。

(20)、女监狱东南紧邻，有一土丘，丘上有一铁钟。钟文记载：“大金帝国铸造”，重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半。当时县治属大名府管辖。建国后，均被政府拆除，建成公路。大铁钟搬移至图书馆内。

(21)、女监狱北，民初建有马队大院，是县骑兵团喂马之处，曾改为县立国术馆。日军占据期间，也用过这组建筑物。建国后，政府拆除，建成公路。

(22)、城西南角内，建有岳王庙，即岳飞庙。殿宇早毁，仍留有两个铁铸人像：一是秦桧，一是秦妻。造型粗犷生动，披发、哭

脸、上裸体，下着裙，双肩背剪绳束，面向南跪。秦桧媚外通敌，陷害忠良，成为千古罪人。与岳飞爱国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铁铸人像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毁掉，地产市民建成住宅。

(23)、西门内路北建有火神庙。殿内有泥塑火神像，头上蒙一块黄布，四角以青铜钱作坠。据传说不能揭开黄布，若揭开要发生巨大火灾（当然是一种迷信）。壁上绘有楚霸王火烧阿房宫、赤壁之战，周瑜火烧曹操战船，火神在空中助火，他的耳、目、口、鼻、手掌、脚心都冒火焰等故事画。地产市民建成住宅。

(24)、庙东是仓道，道东建有粮仓，是官方存粮之处，仓院内北侧建有傲神庙。民初改为铁机织布工厂，称民生织布厂，后因“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关闭，房屋为民购买居住。

(25)、仓道东是五虎街。街北头路东建有王公祠。是参议会为纪念王占元建造的。后改为县立第一初级小学。建国后，建为县委、政府大院。

(26)、西大街，古楼西路南，建有清真寺，不知何时建造。太平天国军曾将寺烧毁，后回民捐资在原地重建。

(27)、城西北角，建有山西会馆。殿内有泥塑关云长之像，壁上绘有关云长出世等故事画，并有戏楼和两厢看楼、茶房等建筑物。

(28)、北门内路东，建有“盗跖庙”，人称“武盗庙”。殿内有泥塑柳夏跖像，壁上绘有车骑、武士格斗故事画。石碑有文记载，不知石碑何处去。这是鲁西一带唯冠县独有的庙宇。建国后，为干部建成住宅。

(29)、庙街东口路北，民国设有红卍字会，人称道院。是释、回、道、儒、耶稣五教

合一，具有迷信性质的慈善组织。院（会）内设有西医门诊所，四乡设分所，免费为人治病。逢有旱、涝灾害，设临时粥场，每天分给饥饿人一碗粥吃。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该会自动解体。院址改为北街初级小学。

（30）、庙南路东，建有公议所。是城关镇长、街长办公议事的地方。土改时分配给贫民居住。

（31）、大十字街四角，各有一个腰鼓型石雕墩子，人称“四大金钢”。每个重约一吨，是防止车辆拐弯时冲毁建筑物设置的。

（32）、大十字街南旧称旗杆街，路西建有瓦屋门楼，挂有“进士及第”匾，是清朝乾隆年间为齐家进士设立的。

（33）、小十字街东路北，新建县署大堂，不及旧大堂的八分之一。知县和吏、户、工房衙门都在这个大院里。民初县令改为县长，“房”

改为科，后改为局。土改时分配给居民所有。

(34)、小十字街南路西，建有地藏庵。殿内有泥塑地藏王像，壁上绘有善恶报应之类故事画。民初还有尼姑主持，尼姑走后，庵无人管理，殿宇渐毁。建国后，为县商业机关建成家属宿舍。

(35)、庵南紧邻，建有鲁班庙。庙内有泥塑鲁班像，壁上绘有鲁班造屋、筑桥、制伞、教授弟子等故事画。庙前是木料市。庙产为商业机关住宅。

(36)、庙东紧邻，是刑房衙门。民初改为科，后改为司法局。建国后成为干部住宅。

(37)、庙西紧邻建有三佛寺。前殿有泥塑的燃灯佛，代表佛教光明，释迦佛，代表救苦救难，讲：“忍”；弥勒，代表普渡众生，讲：“西方乐土”。后殿有艾孜乌、艾孜、夏辛铜铸像。是大食人助唐王朝灭安祿山造反而牺

牲的将军，铸像以示纪念。因无人管理，殿宇早毁。前殿拆除为广场，后殿为居民所住。一九三八年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维翰将铜像搬运至太行山区，以防日军侵华利用。建国后，寺地产权市民建成住宅。

(38)、小十字街南头，也是东轴线的南端，建有关帝庙，殿内有泥塑关云长文像，殿上绘有关云长生平故事画。院内并有戏楼。建国后，改为电池厂。

(39)、庙南紧邻建有阁楼。楼上有泥塑涅槃像，俗称睡佛和三尊女菩萨像，人称娘娘庙。建国后，改建为电池厂。

(40)、庙东是东南街，路南建有赵氏祠堂，人称赵家家庙。四乡赵氏子弟在城内读书，多住在赵家祠堂里。后为居民购买为住宅。

(41)、东门内建有石牌坊，是明朝为梁家举人建造的。日军占据县城后，为筑碉堡用料

将房拆除。

(42)、坊南建有清泉书屋，又称考棚大院，是清朝全县考试秀才的地方，故称考棚。民初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建国后，为东街小学。

(43)、坊西路北建有龙王庙。殿内有泥塑人身龙首像。壁上绘有六十年龙神治水故事画。一龙治水，龙神飞舞云间，口喷水柱，人喜、畜肥、禾苗壮；十二龙治水，个个闭目睡眠，像是死了一样，人愁、畜瘦、禾苗枯。建国后，为干部住宅。

(44)、庙西路北是侯星魁宅院。民初，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曾设在这里。后因故女校迁至棉花市王宅大院。建国后，为城关区政府。

(45)、庙北二百公尺处建有灶君庙。因无人管理早毁。

(46)、庙北偏西，城墙上壁内建有小灶

君庙。传说“小早大晚”，就是说小灶君庙是建城时一起建造的，大灶君庙是建城后建造的。一九三八年破城时，将庙拆除。

(47)、城内中轴线南段，是文明街，街南头同城隍庙街成丁字形，丁字路口南建有大迎壁，壁上砖雕“文明”二字。壁顶上建有起脊飞檐小瓦房，房内有泥雕文昌像。

(48)、街中路东，是修志局，民国改为短期小学，即半日制小学。建国后分给贫民所有。

(49)文明街路西，建有傅公祠。碑文记载大意：清朝咸丰年间县令傅士珍在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军攻陷县城后被俘，并将斩首示众，太平天国军失败后，傅氏子为纪念其父，故建祠堂。堂内有傅士珍泥塑像，民初县支应局（管理供应粮草）设在祠里。县红十字会也设在这里。建国后，将泥塑像拆除，成为文化机关驻地，改建为干部家属宿舍。

(50)、祠北紧邻，建有吕祖堂，即吕洞宾庙。殿内有泥塑吕洞宾像，东、西厢房内，壁上绘有吕洞宾身世及八仙故事画。庙堂有道士主持，并设有中药店，自行医。老道故去，药店停办，形成纯迷信性的求签了。建国后，为文化机关建成干部家属宿舍。

(51)、祠西紧邻是城隍庙。建有兽头三门，抱厦下有木栏栅。殿内有城隍木制像。两厢廊房有泥塑十帝阎君像，黑、白五常等鬼卒像。庙门前左、右有大型石雕座狮。门外对过建有戏台。这组建筑物也属道士管理。民初，国语学堂设在这里，人称“洋学堂”。实际上是学论语，五经四书。后为进德会会址。建国后，烈士祠设在这里。后为文化机关，建成干部家属宿舍。

(52)、文明街北头是东西大街，路北建有大迎壁。滚脊彩釉筒瓦封顶，四角装有彩釉

鸟兽。壁前后四周，皆用彩釉雕砖装饰。中间是浮雕彩釉卧龙图案，工艺精美。建国后，建公安局大院时被拆除。

(53)、壁东西两侧，横跨东西大街，各建有木牌坊一座。坊顶鱼脊彩釉筒瓦，全部木制斗拱托檐。东坊上刻有“金声玉振”四字，西坊上刻有“万古流芳”四字。建国后，建公安局大院时拆除。

(54) 壁北是广场。每天早晨是柴碳交易地，每逢大、小集市是棉花交易地，故称棉花市。建国后，建成公安局大院。

(55)、场西是老邮局，人称信局子。它曾与海盐店交换使用过。建国后，县公安局机关设在这里。

(56)、场东是王宅，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搬迁到这里。建国后，成为公安大院。

(57)、坊北是文庙（即孔子庙）。殿内

有大型孔子泥塑像和顏、曾、思、孟泥塑像。两厢房，有七十二弟子泥塑像，还有茶房等附属建筑。院内有古柏、松，立有十数筒石碑，有名的赵天锡书写的刻碑，不知搬移何处。还有鱼池等。建国后，建为武装部大院。

(58)、庙北是明伦堂，是讲儒学的殿堂，清末民初“单级学馆”设在这里，单级毕业者，方能考进秀才，是全县最高的学府。民初的同盟会员多是单级学生。后来，县立师范讲习所设在这里和文庙中，建国后建为武装部大院。

(59)、庙东邻建有“紫光阁”。是木结构建筑物，年久失修，民国时毁于一次龙卷风。建国后，建为武装部大院。

(60)、阁东建有“奎星楼”。楼为两层尖顶四角筒瓦，楼上有奎星泥塑像，面南，仰首睁目，左手托金印，右手执笔，形象生动。院内有几栋平房，清末礼房设在这里，人称学官。明初冠县

女子小学设在这里，后迁到东街路北侯家宅院。县教育局设在这里。建国后，建为武装部大院。

(61)、楼北、民初建有四合院，是建设局办公的地方，设有气象观察站。建国后成为武装部大院。

(62)、南关中段路东三皇庙内有天皇、地皇、人皇泥像，即伏羲、神农、轩辕氏像。壁上绘有原始人渔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剡木为舟，女娲养蚕、抽丝、织帛等故事画。两厢房内有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鲍姑夫妇、李时珍等十位名医泥塑像，壁上绘有其故事画。每年有庙会，是中药材集散交易地。现成为民宅。

(63)、南关中段路西，在校场坑边，建有天齐庙，殿内有九天玄女泥塑像及故事画。解放后，为财政科长拆除，群众反映强烈，后赔偿南关一部分公款了事。地产成为民宅。

(64)、南关柵栏门东紧邻，建有拱型大

桥。大雨时，水从桥下东流。

(65)、桥南偏西紧邻，建有南岳庙。庙内藏有“佛经”卷数箱，每年有庙会，晒经。建国后，地产成为民宅。

(66)、庙西邻，建有三圣庙。殿内有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泥塑像，殿上绘有三圣故事画。庙宇早毁。建国后，地产成为民宅。

(67)、南关北头西边，二百多公尺处，建有小型土地庙。殿内有土地爷泥塑像。

(68)、东关栅栏门外，几十公尺处，建有拱型大桥。桥南旁可置木板为平桥，推车、挑担者行走方便。大雨时，水从桥下向北流，转向东流。

(69)、桥东岸建有三义庙。殿内有刘备、关公、张飞泥塑像。壁上绘有刘备编草鞋、关公贩卖红枣，张飞卖狗肉以及三人桃园结义等故事画。

(70)、三义庙东邻,建有蝎子庙,殿内有一公尺宽、两公尺长,尾有三公尺翘上梁头的大型泥塑蝎子,壁上绘有螫死恶人,虎豹、豺狼、恶狗、蠢猪而食之等故事画。还有蝎子变化为美女,同恶少接吻,暗藏蝎尾,后螫死而食之故事画。

(71)、蝎庙前有小型土地庙。殿内有土地爷泥塑像。

(72)、蝎、土地庙东邻,建有东岳庙,人称茶花庙。殿内有泰山老母泥塑像,壁上绘有雪山野村,老叟扶杖立门前,观著小儿戏雪;孟浩然带童踏雪寻梅;高山深涧佛手救善人,惩办作恶人;卞庄子刺虎等故事画。以上四庙现均成民宅。

(73)、庙南紧邻,建有拱型大桥。桥西侧可搭木板为平桥,推车、挑担者行走方便。大雨时水从桥下向东流。

(74) 桥南数十公尺，建有桥墩两个，旱季行人、车辆从两墩间通过；大雨时搭木板为平桥行人。水从两墩间向东流。

(75) 蝎庙北邻，有一土丘，丘西侧建有桥墩两个。旱季行人、车辆从两墩间通过；大雨时搭木板为平桥行人。水从两墩间向东流。

(76)、庙北二百公尺左右处，民初建有官办苗圃，人称花园。属县建设局管辖，主要培育树苗，兼植花草。从南陶至聊城的公路两旁种植的小叶杨，就是这里培育的。

(77)、北关栅栏门外西侧紧邻，建有桥墩两个。旱季行人、车辆从其间通过；大雨时墩上搭木板行人。水从两墩间向东流，转向北流，又转向东流。

(78)、桥北数公尺，建有北岳庙，人称奶奶庙，实际上是佛、道两教合为一庙。庙门是三间小殿，中间开门引人出入，两边是左

青龙、右白龙哼哈二将泥塑像。门里是两厢配殿，壁上绘有四大天王画像。两厢之间有一小殿。殿内有弥勒佛泥塑像，人称大肚子佛。

小殿北是前大殿，殿内有释迦牟尼、普贤、迦叶和十八罗汉以及倒座观音菩萨泥塑像。这组建筑，院内植有松柏，有数筒石碑。

前大殿北是中殿。人称三官殿，殿内有三尊泥塑像：

当中为：元始天尊，右手大母指和食指捏一园珠，象征【洪元】。

左边为：灵宝天尊，双手怀抱坎离匡廓图，象征【混元】。

右边为：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右手持扇，象征【太初】。西壁上绘有三十六洞天，东壁上绘有七十二福地等故事画。殿后廊房，有王灵官泥塑像、壁上绘有钟馗故事画。中殿东紧邻是一小殿，殿内有土地爷泥塑像。小殿东

数公尺是向东的庙门。这组建筑，院内植有槐树，有石碑。中殿北是后大殿。殿内有十五尊女菩萨泥塑像，还有泥塑假山，山上有树木、花草、禽、畜、兽以及各式人物等小型泥塑像。壁上绘有飞天、舞蹈、奏乐等故事画。后殿的西厢殿，是十帝阎君殿。殿内有十帝阎君泥塑像，牛头马面、鬼卒夜叉、黑白无常泥塑像。壁上绘有十八层地狱，人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故事画。这组建筑，院小无树，只有石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学生将泥塑像捣毁。因无人修缮大部倒塌。军阀韩复榘在山东执政时，将残庙平毁改为县立乡农学校，是对乡丁进行军事训练的地方。建国后成为机关和居民住宅。

(79) 庙西偏北，建有桥墩两个，旱季行人，车辆从间通过；大雨时墩上搭木板行人，水从墩间向东流。

(80)、北关栅栏门外数公尺路东，建有

桥墩两个。旱季行人，车辆从间通过；大雨时墩上可搭木板行人。水从墩间向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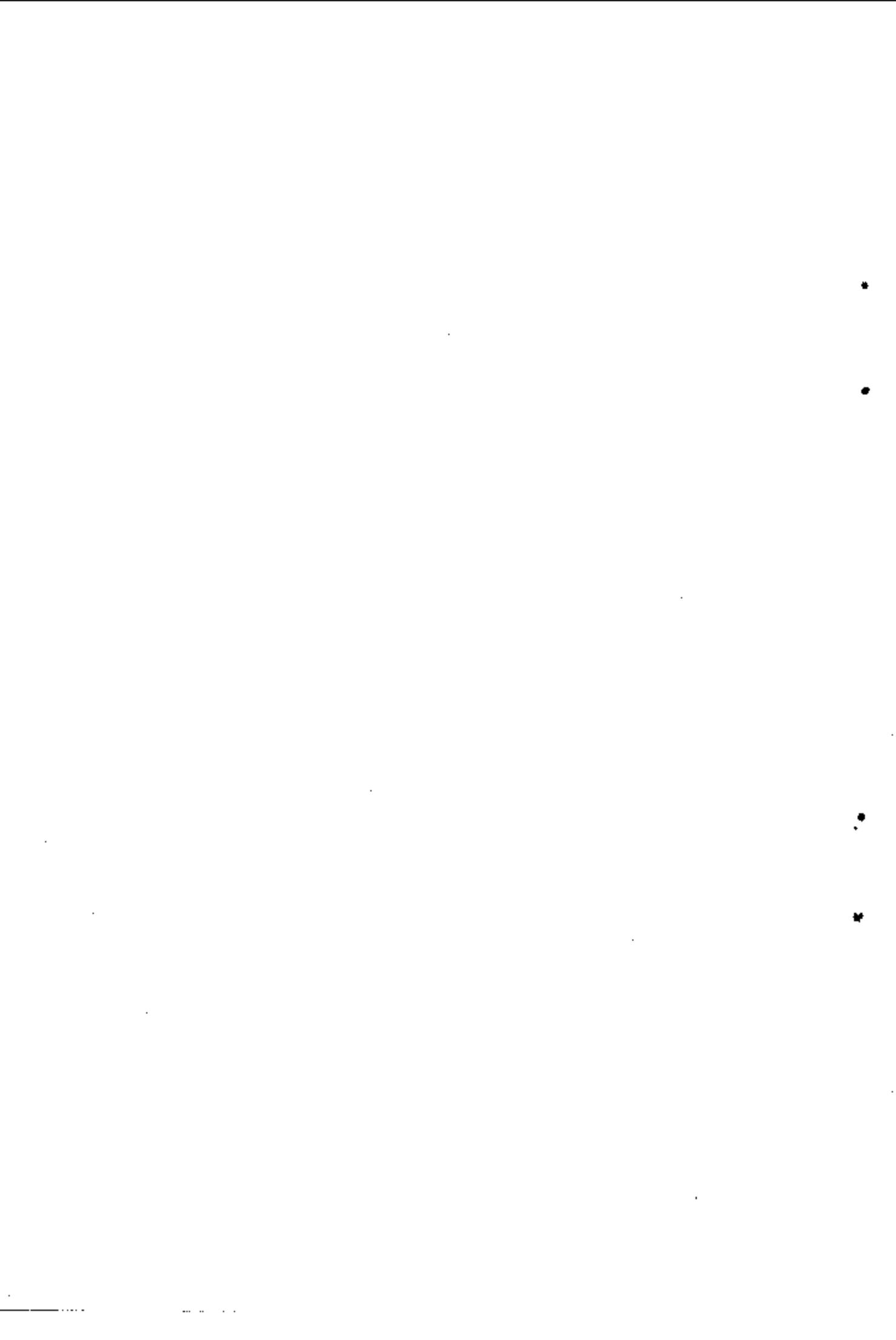
(81)、桥北紧邻，建有关公庙。殿内有关云长大型泥塑像，是城关第二大型泥塑像，并有关平、周仓泥塑像。壁上绘有关云长战斗故事画，并建有戏楼，楼下三间，中间是大门，供行人出入，两边是战马和马童泥塑像，殿前两厢，建有看楼。院内植槐树，有数筒石碑。碑文记载的大意是清水镇杜家建造。据传说：关云长征战时到过清水镇，同杜家结为友好，故杜建此庙，以示纪念，庙经多次重修，碑文都有记载，杜家捐资最多。建国后，粮食局建成干部家属宿舍。

(82)、北关柵栏门外，百公尺处，建有真武庙。匾额刻有“玄天大帝”四字。殿内有真武、雷公、电将、雨神泥塑像。壁上绘有真武弃家入山修炼，遇虎、豹、豺狼、巨蝎、大

蛇，都化险为夷，羊羔踏乳；乌鸭反哺；老妇铁杵磨锈针；济世救人等故事画。有庙会，有庙产，清末民初有道士主持。道士故去，由会首轮流主持，后交贫民居住维护。建国后，修建公路将庙拆除。

(83)、西门外，一公里处建有两岳庙，殿内有南海观音座莲；大智文殊骑狮；慈航普贤座像等泥塑。因无人管理庙宇早毁，地产为民耕种。

这幅示意图及其说明、只是个人回忆、挂一漏万，差错难免、仅供参考，希望知情者修正补充。



冠县村名由来

郝瑞琛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在生活，生产当中为了区别不同的地理实体，便于记忆和交流信息而进行的得到社会公认的命名。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它同样有错综复杂的变革过程，冠县749个自然村，其名称的由来，有的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秦汉两朝。全县大多数村庄因元末战乱被毁，又新建或重建于明朝初期。在明初建立的村庄中大部分居民由山西直接迁来，另一部分由河北省大名县和山东省蓬莱县迁到冠县定居。

冠县在1980——1982年对全县村名进行了追本穷源的深入探索，有些村名富有离奇的神

话传说，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

全县村名由来，大致可分以下十个类型。

一、以人名或姓氏命村名的

以人名命村名的有12个。如烟庄乡张平村原有晓春亭，据史料记载：系战国时亚圣孟子晓谕景春处，亭为汉张平子所建，故名村张平。

甘官屯乡王二庄，因王二家贫奉母至孝，遂定村名为王二庄。

甘官屯乡刘贯庄，原名刘庄，明朝崇祯年间，村中有一名医刘老贯，遂以其名改村名。

解放后，为纪念本村抗日烈士耿锡华，清水镇的西焦庄改名锡华村。

以姓氏命村名的有454个。这类村庄为数最多，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如定远寨乡的呼家，侯家、高家；桑阿镇的郭

家、泮家，开头的第一个字就是该村居民的姓氏。也有两姓或三姓名村的，如贾镇的杨马庄、崔庞庄。柳林镇的岳刘庄，明景泰年间岳刘两姓从山西洪桐县迁此立村。柳林的倪屯，明洪武25年倪、辛、周三姓立村，称倪辛周村，至清乾隆年间，辛，周两姓绝嗣，遂改今名。

二、事件、古遗址、姓氏结合

冠县境内有两处旧城遗址：一是梁堂乡的杨黄城。据《山东通志》记载：“春秋时名黄邑，在冠县城南十里，今黄城村。”元初，杨姓迁此建村，故名。一是北馆陶镇的肖城。宋景德元年，辽肖太后摄国事率其弟挞览侵潭渊，筑城于此，故名肖城。

还有一些村庄，因建有庙堂，佛寺、古桥等而得名。如定远寨乡的郭关庙，明初郭姓人

立村时村内有一关帝庙，故名，简称关庙。桑阿镇的桑桥，建村时因村东鸿雁江上有一桑木桥而得名。该镇的白佛头，是因村头建有白佛寺而得名。孙疃乡的唐寺，因建在村东唐朝古寺旁，故名。甘官屯乡的蚕姑庙，西汉中期名桑园。西汉末年光武帝刘秀转战山东，一次兵败溃逃，被桑园蚕姑掩护脱险，刘秀称帝后送礼酬报，建蚕姑庙，今演变为前庙。万善乡的孝子哭。春秋孔子弟子冉仲弓周游列国病逝于此，服孝者皆哭，取名孝子哭。

三、以吉祥嘉言为村名

桑阿镇的风庄，明末马姓人迁此立村时，有祥云如凤凰来仪，故名凤凰庄，今简称风庄。辛集乡的义和庄，明初，许、王、张，三姓由山东蓬莱县和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三姓人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取名义和庄。诸如甘官屯

乡的太平庄，辛集乡的兴太集，元造户乡的三固庄皆属此类。

四、物产与职业为村名

以姓氏与职业相结合的村名有范寨乡的张坊，大纸坊头、小纸坊头；柳林镇的油坊；北馆陶镇的前纸坊，后纸坊，桑阿镇的南油坊。如北馆陶镇的纸坊，两户阎姓于明弘治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以造纸为专业，故名纸坊。今分为前后纸坊。柳林镇的油坊，系樊庄一户王家香油坊在此打油，清末，人口繁衍独成一村，故名油坊。

以物产为村名。贾镇的花果屯，茉莉营；范寨乡的芦贯庄；定远寨乡的杏园；孙腔乡的芦村；元造户乡的大桑树等。如范寨乡芦贯庄，明初，程邵两姓迁此立村。因此地盛产芦苇，当时以皮厚、包节、耐用享有盛名，故名

芦贯庄。

五、以民间传说为村名

这类村名来自民间传说，都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如白塔集乡的白塔集，据传说，唐末有一老汉在此立村。一天夜里，他梦见天神，因与托塔李天王有隙，趁他熟睡的时候，天神盗出了他的宝塔，偷偷下凡来到村西。正在这时候老汉忽然醒来，他带着儿孙忙往村西头去看，果见村西有一白塔，在白茫茫的云雾中飘绕，天神见有人来，怕泄露天机，大惊失措，急忙托起宝塔飞驰而去。此事在当时传为奇闻，村因而叫成白塔村，以后起了集又改称白塔集。

冠城镇的刘神伯村。据传，南宋末年，有一刘姓老伯在此立村。不久元兵入侵，在战祸连绵日子里，一次、兵乱，刘老伯躲避不及，跳入井内，过数日后才打捞，刘老伯完好无

恙。他说：“初投井中浑浑噩噩，又觉得飘飘然如入仙境，在一村下遇二叟对弈，我观看许久，得食鲜桃一只。二叟说：“我们乃漳（河），卫（河）的河伯，因汝急公好义，有长者风，今奉天命特来搭救，你食桃后，可化险为夷安然无害。”说完，二叟忽然不见。”村里人听后喜为神佑，都来为他庆贺，自此村名也就叫成刘神伯了。

六、因犯讳而更改的村名

兰沃乡兰沃，明洪武年间，鲁任二姓承山西祖籍村名在此立村，名狼窝。羣众以为不雅，谐音改称兰沃，因人口繁衍始称大兰沃。

辛集乡的火烧茔，明初建村，因村址西近范氏墓地，卜为不吉，改称火烧营，意在火烧范氏茔（营）。又如该乡的康马寨，宋代此村称米八寨。因吉姓卜葬墓地于村北，讳鸡（吉）

吃米，遂改村名为康马寨，今分为东西康马寨。

七、以山水地理命名

以山水地理为村名的125个村，这类村庄大多以山河、气候等自然环境命为村名。

东古城的秤钩湾。明永乐年间，张姓人迁此傍卫河建村，因村东一段卫河湾曲如秤钩，得名。辛集乡的骆驼山，旧时淋盐弃土积年成山，形似骆驼。宋天圣年间，李常两姓迁此依山建村，因以为名。清水镇的汪村，卢姓明初建村于此黄河故道涝洼地带。盛夏积水茫茫无际，如汪洋大海，故名汪村。今分为东西汪村。

八、以战事轶闻命名

北馆陶的木堤。据传，北宋时，辽以倾国

之兵南侵，杨家将奉命御敌，被称之为杨无敌。后温姓迁此建村，名为无敌，群众以村名讹传为木堤。定远寨乡的王朝营，宋初建村。因村址系宋王朝兵营旧址得名。斜店乡的史村。据考：战国时，魏与赵攻韩。齐救韩，孙臆用增兵减灶的军事战策，大破魏兵，射杀魏将军庞涓于马陵，虏魏太子申以归。太子死，葬其头于谷（子头），葬其尸于此。后张姓建村，名张尸村，今演称张史村。杨召乡的杨召，宋景德年间张姓立村，相传，杨家将招兵抗辽，在此设幕府，招募兵勇，故名杨召（招）。

九、以地形特征为村名

斜店乡的斜店是因为村形斜向和傍路设店而得名；烟庄乡的五岔路因建村于五岔路口而得名；店子乡的四个当铺（堡），皆因临古军

事堡垒立村而得名。还有只以地形特征为村名的，如贾镇的廿里铺，烟庄乡的十里铺就是因靠急递铺（元代设立的驿站亦名急递铺）建村而得名。清水镇的清水堡，贾镇的贾镇堡，明嘉靖22年知县姚本所筑，为明时抵御外侮和平息内乱的军事重地，今堡毁不存，均已改称镇。

十：新命名的村庄

在地名普查和农村体制改革中发现的53个重名的村，都进行了标准化的更名，如两个油坊、桑阿镇的改名南油坊；两个菜园，把范寨乡的改为东菜园。

对少数用字生僻和村名不雅的通过普查也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如东古城的吝庄改称藺庄，贾镇的仁儿庄改为仁二庄等等。

冠县西沙河的变迁

李 义 善

自西汉末期，冠县西部就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百里大沙河。这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留下来的遗迹。两千年来，多少仁人志士都想制服这条“沙龙”，为民兴利造福，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成效甚微。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治理沙河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沙河治理成绩显著。

一、大沙河的来历

黄河几千年来，途经黄土高原，河水挟带大量沙泥奔腾而下，年长日久河床淤积，河道

堵塞，致使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据水电部编《人民黄河》一书统计，在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大小一千五百六十三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冠县的西沙河就是公元十一年（王莽建制三年）黄河大改道后留下来的旧河床。当时，这一段为下游的中心水道，历史上称禹河，后称王莽河。据《行水金鉴》记载：“禹河故以沙丘堰为禹迹，推其意，似谓古河本东行，禹作此堰以降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又说：“一则此读王莽时空，故世俗名是读为王莽河。”

冠县原来并没有黄河，公元前六百〇二年，周定王五年，黄河自宿胥口改道后一股东流为漯川；一股北流，经黎阳、元城、大名、馆陶、冠县、临清、平原等地，名曰卫河。从此我们这里开始有黄河，上始河南黎阳宿胥口，经黄骅县西南一带入海，总长一千多华

里。

《行水金鉴》卷首记载：“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六百〇二年）禹河初徙，王莽始建国三年（即公元十一年）河再徙，千乘入海。”（注千乘县，古海口，称千乘海口，是当时的黄河入海处）。这次河决，魏郡、临清以东数郡（决口处是濮阳境内胡安附近），改道东流，经聊城以东，大清河以北。冠县自黄河流入到改道后，前后共六百一十三年。所遗留的这条黄河故道，至今已有一千九百七十七年的历史，冠县境内中心河道一百华里，加上支岔共一千三百五十华里。南北形成纯沙荒11.8万亩，东西支岔共4.7万亩，总计16.5万亩，广及12个乡镇，243个村庄。

二、古今治理沙河的追述

自西汉末年黄河改道以后，原故道的广大

区域就变成了黄沙茫茫，草木不生，禽兽不栖。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

至隋，人们为逃避兵燹劳役之苦，才陆续迁徙于此。但遇风起沙移，蔽日遮空，往往村宅并逝，人亡庄没。故道中段的李菜村，因风沙之害三次迁徙，1942年春的一场大风后，一千多亩小麦竟被黄沙覆盖了二、三尺厚。故道北段的刘屯等村庄正象民谣所说的“有风没有家，屋里屋外都是沙”。1949年春的一场大风，风沙埋掉800亩庄稼，许多农民背井离乡，不少人饿死在要饭路上。当时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歌谣：“一场风沙扬，遍地一扫光，一年辛劳被沙吞，携儿带女去逃荒。”故道东岸的大屯，因无法生活，到解放前夕，全村几乎走光，村址变成一片荒凉的沙丘。但历代改造沙荒的不乏其人。唐一高僧在故道东岸（今唐寺村西）筑起了避风修贤的大寺，祈求神灵降沙

赐福，后因风大沙移，不得不迁走。宋辽时期这里成了硝烟弥漫的古战场。据传说，今之召村是辽国当时的招兵站，烘炉营是当时的兵工厂。至清代，虽经千百年繁衍生息，这里还是人烟稀少，满目萧疏。传说一千五百年前人们就在现在的兰沃和甘屯乡南部一带试栽毛白杨。曾有一县令提出：“植树造林利倍数谷”的改沙方案，并在现在的刘屯东南荒沙滩上造起面积达60亩的杨树苗圃。民国末年的一位叫侯光陆的县长也曾在清水镇的大屯村南的沙滩上建了一处400亩的林场，即今清水林场。表现了我县历代人民治理沙荒故道的决心和愿望。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大力发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工作。从五十年代开始，首先是搞试点，分段分片治理，在中段造起了一个2000多亩的棉花良种场；在

北段建起了一个500多亩的乡办林场；六十年代又在中段建起了一处县苗圃；北段扩建了一处木本粮油林场；七十年代改为现在的毛白杨林杨。在李莱、汤庄、马固、田庄、吉固、召村等地造了成片的刺槐林。

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县委、县政府把治理黄河故道作为造福于人民的千秋大业来抓。制订了“林、渠、路、村、国营场圃统一规划，风、沙、旱、涝统一治理”的方案。在兴办和扩大国营场圃的同时，又先后建起了4000亩的国营农牧良种场和斜店乡、孙町乡、北陶镇、万善乡、清水镇、店子乡、兰沃乡等乡镇苗圃林场。沿河两岸村庄的干部、群众平沙开荒，打井挖渠，育苗植树，对黄河故道进行了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更是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对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改变了沙区的落后面貌,恢复了生态平衡。1980年,我国政府为冠县开发故道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了改造沙荒、植树造林的申请计划。于1982年11月5日正式签署了第一期项目协议,规定:1982年12月5日至1985年12月造林2520公顷。1984年7月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评价组,对一期造林进行了中期评价,由于一期工程合同执行好,造林质量高,又提出我县扩大造林面积为2700公顷。1985年10月批准了这一项目,第一期造林工程按期完成。其中,毛白杨985.4公顷,欧美杨564.5公顷,泡桐970.1公顷,打机井249眼(多数已配套),修桥涵闸4座,开沟挖渠70条,长达150公里。第二期工程到88年春已基本完成,两期共造林5200公顷,打机井350多眼,挖沟渠90条,总长350多华里。修路120多条,

总长为278.6华里，栽毛白杨、刺槐为主的材林10万多亩，经济林6万多亩。另外还有部分灌木、编条、观赏树和花草。成了贯穿全县，从西南到东北的一条百里绿色长廊。

三、沙河绿洲

喜看今日沙河，一行行一片片的毛白杨林，一方方的桐粮间作，远远近近的防护林带，路两旁上乔下灌的林木，两岸大片的苹果、鸭梨、山楂园接连不断，形成沙洲林海，一派生机。

1、这里是木材基地。整个故道及沿岸有13万亩材林。已有五分之二以上的成材或接近成材。早期栽的毛白杨胸径达30多公分，毛白杨林场蓄积量已达万方以上，刘屯一个村有21万株材树，人均105株，木材蓄积量已在万方以上。世界粮援项目造林两期7.83万亩，

合5220公顷。目前生长良好，树势健旺，实现成林、成材、速生、丰产大有希望。

2、这里是果品基地。到目前为止，黄河故道和沿岸的区域已有经济林7万多亩，结果的达4万多亩。年产果4千多万斤，仅北段的刘屯和韩路两村年产果达1500万斤。

3、这里是科研和苗木良种基地。

从1982年开始，国家“六五”期间的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全国毛白杨选育攻关项目，设在我县苗圃，由北京林业大学和山东省林业厅具体承担，全国著名的林业育种专家朱之暉教授亲自负责。这里毛白杨优良树种最全，被一些专家教授称为是全国毛白杨的研究中心。冠县苗圃是林业部和山东省林业厅直接抓的林木良种基地。北段的毛白杨林场是林业部规化院和中国林科院的试验林场。有关毛白杨的试验研究项目多数设在这里实施。黄河故道的国营

场圃和乡镇场圃多数已成为育苗基地，毛白杨和泡桐等优质大苗，远销到全国十多个省市栽植。对华北中原地区的林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地处故道南段的农牧良种场，有成羣的荷兰黑白花奶牛，美国杜罗克瘦肉猪，罗曼肉鸡等优良品种，成为我省名副其实的良种科研基地。

4、这里是外贸出口和乡、镇企业的原料基地。黄河故道盛产的冠县大鸭梨，每年有六七百万斤出口，深受东南亚各国的欢迎。县苗圃酱菜场生产的蒜米远销欧洲；桐木大量销往日本。

故道树多，叶多，草多，为牲畜家禽发展提供了饲料来源。全县28万只羊，13万只兔，沿故道的村庄占了近三分之二，此外，还提供大量花生、油料和畜产品，有力地支持了全县的乡镇企业和外贸出口。

5、这里是绿色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大量植树造林，平沙丘，挖渠打井，治服了这里的

风沙，使原来的16.5万亩纯沙荒，成了葱郁的树林，间种了大量花生、棉花、大豆、地瓜和蔬菜，对农田起到了防护作用，使故道两侧的30多万亩良田免受了风沙危害，多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据刘屯、韩路等村统计，仅水果一项每年人均收入500元以上。

冠县黄河故道的变化和开发，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原林业部副部长全国林木花卉协会会长刘琨同志，1986年5月25日来冠县视察林业时题了“沙洲林海”、“冠县林业争做全国之冠”之词；原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同志86年视察冠县林业，看了故道造林后题词：“园田林网化，冠县堪效仿”。同年，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视察冠县林业后题词：“沙河绿洲”。

这几年国际上先后来冠县考察黄河故道造林的有二十多个国家，有以世界粮食计划署临

时执行主任亚列山大先生为首的十国外交使团，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中国项目官员布郎布雷，彼得塞尔默等，还有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瑞典、加拿大、比利时、土耳其、英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的专家、教授。各国来考察的专家对故道沙区造林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冠县苗圃所培育的毛白杨良种大苗和沙区所造的毛白杨速生丰产林，从造林质量、长势上看都是少有的，他们称冠县是毛白杨良种圣地，是中国北方造林的好典型。

冠县林业
全国之冠
化

冠县林业
全国之冠



国际友人考察冠县林业时的留影

一九三七年冠县大地震

梁 增 生

1937年8月，冠县发生大地震。

县科委张怀轩同志回忆说：地震那天，天还不亮，先听到惊天动地的轰雷声，接着大地摇晃起来，一起一伏，人如在行船上。几秒钟之内，墙歪麦垛倒，部分老房塌陷。天黑之前又发生一次。康寺地康延年老人说：1937年地震时，屋里的锣鼓等叮叮咣咣自动响起来，桌上墙上的东西掉在地上。贾六庄王泽安老人说：大地震时坑里的水被倾倒于坑外。80多岁的王崇和老人回忆说：大地震前坑水翻花，摇荡，无风向岸边涌。曹里村曹西章家的瓦房东山墙被震塌。

山东省地震史料汇编记载：1937年8月1日，04—35—48—和18—41—05在菏泽分别发生7.0级和六又四分之三级地震。冠县虽震动强烈，但不是震中区。因有部分房子、墙倒塌、裂缝等，冠县应是6—7裂度区范围。

1937年8月《华北新闻》刊登报导：“聊城：一日晨4时50分，本县发生剧烈地震。是时居民多未起床，咸于睡梦中惊醒，男妇狂奔，大为惊愕，幸历时未久即停。午后3时许忽又震动，一时器具什物摆动不已，破房土墙多倒塌，人民惊逃，市内秩序大乱。”

1937年9月27日，莘县县政府函称：“本县8月1日4时30分复震一次，但震势不甚强烈，多数人有感，小用具有移动，房屋虽多受震动，破坏倒塌者绝少，无地裂井泉水的变化。”

看来冠县和聊城地震破坏情况相似。但莘县距震源区较冠县近，而震害反轻。这可能是因

为冠县处在地质构造格架的结点部位的缘故。从地质构造图上看，冠县一带地下有磁县至聊城近东西向的深大隐伏断裂带从冠县南部通过，西部沙河一带是沧东断裂的南端；聊考断裂从东邻聊城经过；还有从金沙滩入境经施庄铺、北皇城、赵辛庄、王朝营及辛集乡、五岔路，并转弯朝北直到夏津的冠县断层，贯穿全境。且在堂邑附近几乎与堂邑断层相交。所以冠县处在多组构造线交汇部位。在大震时，处在地质块体边缘和棱角的地方出现震动大，破坏性强，烈度高，造成地震灾害的不均匀性。

冠县烟庄乡张家庄几位亲身经历大地震的老农回忆三七年大地震时说：村中路北一眼老砖井，地震前突然干底，全村人无法吃水，都很纳闷，因为这眼井，连村里年龄最大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成井的。井水向来是打不干的，那怕是最旱的天气，井里也没断过水，

村里人想淘井却无法把水抽干。当时村里人趁井干的机会，清理了井内的污泥物等。据说井内还挖出过1403年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件瓷瓶，后来被江南人买去。地震后，水位恢复正常。大家才知道井干与地震有关系。说明该井与深层地下相通。地震前地下水重新调整过程中，水位突然下降，出现井干现象。

清水乡文村老农讲潭坑的故事。该坑位于黄河故道内，三七年上大水时，在文村东边，洪水嗷嗷叫，水光打旋涡不走，实在吓人，直到白家坟搬迁后，大水才冲开堤坝，往北流去，到汪庄附近与卫河相通。听起来好似神话，而实际可能是因为大面积洪水，特别是大地震前夕断裂构造活动加剧，使水很容易沿断层往深部渗漏，洪水吼叫，打旋涡不走，是在此处往地层深部灌注形成地上水与地下水相通。洪水过后，留下“无底坑”。用地质观点看，本现

象是构造活动强烈引起的。

冠县气象灾害史略

戴万德

冠县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冬冷，降水集中，光热、水等气候资源丰富，但旱、涝、冰雹、大风等气象灾害发生频繁，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威胁。解放后，人民不仅做了国家的主人，而且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打井挖河，修路造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已大大加强，但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仍是限制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旱涝风雹是冠县历史上的四大灾害。

一、旱灾

旱灾是冠县最主要的气象灾害。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455年至1985年的五百三十年间，本县发生旱灾61次，平均8—9年一次。1484年（明成化19年），秋苗枯死，造成人吃人的惨景。1493年（明宏治6年），受旱民饥，大疫流行，死体相枕。1585年（明万历13年），春，大旱，人剥树皮、挖草根以食。1640年（明崇祯13年）春，大风大旱，野无青草，生蝗蝻，夏，大疫，死人无数，冬，民大饥。1641年（明崇祯14年），6月初，大旱生蝗，食苗几半，7月中旬粮贵，民大饥，父子相食。1644年（清顺治元年），春夏无雨，作物歉收。1645年（清顺治2年）春夏无雨，连年大饥。1900年（清光绪26年），春夏旱，野草无生。1920年大旱，人食草根树皮，逃亡男女达十分

之四。1927年，大旱，禾尽枯，三伏天滴雨未落，春苗枯死，粟粒未收，人民背乡离井。1942——1943年在天灾匪祸的双重摧残下，造成了目不忍睹的特大灾荒。1942年秋，大旱，麦子未种。1943年旱情更重，春苗未出，赤地百里，寸草不见，人民四处逃难，舍儿卖女，饿死无数。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同旱灾进行坚决的斗争。截止1984年，全县打机井14000多眼，建扬水站55座，购排灌机械210952台，24万7千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80%左右，抗御旱灾的能力大大加强。1965年、1972年，1978年发生大旱，年降水量300—360mm仅为历年平均降水量的二分之一，但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开展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抗灾斗争，仍夺得了较好的收成。

二、涝灾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冠县年降水量的60—80%集中于夏季6—8月份，而且年际变化大。卫运河上游的卫河、漳河均发源于太行山区，西高东低，顺流而下，决口、泛滥，因而水涝灾害时常发生。1455年至1985年，共发生涝灾52次，平均十年一遇。1455年（明景泰6年），大水平地深尺余，苗淹没殆尽。1478年（明成化14年），6月连日大雨，田禾淹没，舟楫出入城中，从莘县往章丘、临清者，竟舟而去，岁大饥。1552年（明嘉靖31年），卫河复决，大水鸣如牛声，数日遂东移。1653年（清顺治10年），自6月淫雨不止，房屋淹倒，陆地引舟，城东苗尽被淹死。1703年（清康熙42年），5月淫雨连绵，田禾淹，平地水数尺。1716年（清康熙55年），夏5月大雨

霖，漳卫决，6月14日——15日大雨如注，至21——22两日，平地水深数尺，禾苗尽淹。1873年（清同治12年），5月初大地震，震时似雷声，有大雨。6日，庐舍倾塌，田禾尽没。1892年（清光绪8年）闰6月河水泛，卫河东西两岸各县尽成泽国。1937年6月，大雨连降半月，漳卫河决口，平均水深3—8尺，全县尽成泽国。大船从县城可直达聊城，淹死人畜，漂失房屋。损失财物，无法计算。7月地震，房屋摇动。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视这种惨景，不但不救灾，反而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闹得人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1953年，年平均降水量668mm，集中于7、8月份，占全年77%，再加上分布不均，全县受灾15.9万亩。1956年，卫河决口，水淹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绝产面积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县人民政府组织全县人民投入抗灾斗争，中央人民政

府派飞机空投救生圈、熟食，省地调来许多船只，救民脱险。1963—1964年，年降水量达771.9和835.6mm，七一八月达508.1和425.5mm，卫运河两次向西决口，本县境内涝灾严重，受灾面积达16—24万亩。

暴雨是形成涝灾的根本原因，由于它来势猛，历时短、雨量大，往往造成内涝成灾。据三十年气象资料统计，本县年平均暴雨数2—5次。最多的1958年和1977年各出现5次。1958年7月12—14日连续三天暴雨，总量达324.3mm，造成23.4万亩农田积水受灾。本县共出现100mm以上的大暴雨11次，最大一次在1981年8月16日，降水总量达207.3mm，造成全县60万亩农田积水，重灾15万亩、绝产5万亩，倒房1500余间。

三、冰雹

冰雹也是冠县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对工农业生产破坏力很大。常因降雹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产，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据县志记载，1529年（明嘉靖8年），雹大如鸡蛋、麦尽，伤人。1535年（明嘉靖14）4月，雨雹自西北来，大如鸡卵，麦尽殒。1596年（明万历24年）夏，雹如碗，禾尽殒，屋瓦皆碎。1672年（清康熙11年）4月，大雨雹，城东麦尽殒等等。建国以来，据调查，本县境内共发生严重雹灾31次，每年平均0.8次，一年之中4—10月均可能有冰雹出现。但以春夏之交的5、6月份最多。1952年上旬，6月中旬和9月上旬，本县降雹三次，成灾面积为9023亩。1953年8月中旬，本县万善、柳林、南陶、贾镇四处乡镇降雹，受灾37277亩，大部分

作物减产1—2成，重者减产5—6成。1962年5月上旬和6月中旬两次降雹。1965年4月29日，6月13日，7月3日、7月23日，四次降雹，总受灾面积达84.38万亩，4月29日，全县45处受灾，受灾面积达738541亩，其中小麦受灾317427亩，成灾235980亩，占总面积的44.7%，减产8成以上的有10.73万亩。棉花造成重播的达39.5万亩，并砸伤111人，冰雹直径一般20mm，最大60mm，柳林镇附近最大积雹深度达半尺，降雹时间达20—40分钟。1970年6月24日，本县梁堂乡、城关镇大部，桑阿镇西部降雹，清水、甘屯、范寨乡等地也有点片发生，受灾面积12.7万亩，棉花被砸光杆3.97万亩，被迫改种，因伴有8—10级大风，刮倒树木很多，造成化肥厂停产。1975年6月5日，辛集乡大部和范寨乡的部分地区降雹并伴有8—9级大风和中到大雨，冰雹大的如杏，一般

似枣，小的如豆，受灾面积4.5万亩。其中棉花1.74万亩，小麦2.47万亩，玉米、地瓜3000亩。1976年6月6日，北陶、清水、兰沃、辛集四个乡镇降雹，并伴有6—10级大风，46个村庄受灾，重灾23个，受灾面积4.83万亩。其中小麦2.35万亩，棉花1.12万亩，其他作物1.35万亩，倒树4.95万棵。1982年6月6日，16个乡镇受灾。受灾面积51.04万亩，棉花被砸光杆14.57万亩，粮田重灾7.93万亩，倒树17.5万株，毁房5689间，伤人53人，是历年来雹灾最重的一次。1986年8月10日，全县22个乡镇，有12个受灾，受灾面积30万亩，成灾20万亩，重灾5万亩，绝产5万亩。倒树14万株，伤10余人，杨召乡受灾最重。1987年8月16日本县10个乡镇受灾，受灾面积20万亩，成灾12万亩，毁房408间，，刮倒树6万余株，北陶、烟庄受灾最重。

四、大风

大风，一般是指瞬时风力。八级以上的风，能拔树拆屋，飞沙走石，造成人亡畜死，危害极大。有史以来，我县风沙危害十分严重。1851年（清咸丰元年），大风拔树，日、月失明。1901年（清光绪27年），正月十九，辰刻，黑风突起，飞沙障天，行人死于途，大寒麦枯。1926年（民国15年）、6月，大风雨，拔木伤禾屋瓦飞。1935年5月11日，全县11级大北风，北满才地里刮死2人，麦子减产五成，高地、沙地绝产。1943年4月19日，西北风10级，连刮三天，麦子减产3—4成，安庄、高庄等村小麦绝产。1948年5月16日，安庄、社庄、辛集10—11级旋风，社庄三排房被刮倒。1952年5月中旬，桑阿镇三把粗的大树被刮断，小麦减产三成以上。

1957年冠县气象站成立。多年来对风力进行了详细的观测记录。冠县每年平均大风日数11.8天，最多的1966年达68天，各季大风日数以春天最多，冬季次之，夏秋较少。大风风向以东北风最多。1977年5月13日，东北大风9—10级，瞬时最大风速28米/秒，连续8个小时，造成棉花，玉米、大豆、地瓜等幼苗大量死亡，果树落果，全县受灾春苗59万亩，使大田棉苗减少了20—50%。正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大面积倒伏。

值得指出的是平原绿化发展得很快，产生明显的生态效益，风沙危害已明显减少，1980—1984与历年平均值相比大风日数减少52.7%，扬沙日数减少19.4%，沙、尘暴日数减少了79.8%，这充分说明，植树造林，搞好平原绿化是维护和改善农业气候，减少自然灾害、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

冠县一中简介

珍堂 士煌 树椿

1950年秋，冠县一中始创时命名为冠县初级中学。校址在城内古楼南街路东的城隍庙，房子共21间，付公祠做伙房，大殿做教室。两个教学班，5名教师，他们是王乃文、刘延伦、宫秉礼、吴珍堂、吕淦泉，校长由县长杨恒一兼任。

1952年秋，该校迁北关路西（今县委招待所），新建房54间，7个教学班，占面积30亩。1953年学校往西扩展20亩，建房67间（今教育局和师范家属院），到1957年共建房170间，招收高中4个教学班，初中11个教学班，教师增加到30名。这期间，冠县一中稳步提

高，健康发展。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工作积极，学生情绪饱满，进取向上，刻苦努力，师生互敬互爱，教学相长，好人好事，蔚然成风。这所中学，从创建到1957年，规模逐渐扩大，班级不断增加，井然有序，学风良好，经常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学生家长的称道。

1959年，冠县一中规模再度扩大，迁至吕庄西头（即今校址），占地136亩，先后建房11490平方米。为贯彻党中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还建有占地30亩的农场、饲养场、铁工厂和木工厂。

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冠县一中秩序正常，抓教学成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校级和中层领导班子成员，个个抓纪律，人人深入到教室听课，协助各教学研究组开展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教师加强“双基”，精讲多练，人人制

订了进修提高的具体计划，相互听课观摩，共同研究，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开展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活动；教职员对学生严格要求，特别加强了思想品德教育。另外，充实了仪器室、实验室和图书室，加强了伙食管理。这几年，冠县一中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生德智体得以全面发展，高考、中考均跃居聊城地区的上游。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击到冠县一中，全校所谓“破四旧”、“反复辟”、“停课闹革命”，校园顿时一片混乱。1970年，好端端的冠县一中被解体，广大教职员云散各地，有的回原籍，有的调到别的行业，多数被分派到全县各公社所属的中小学任教。原占地百亩的一中校院，成了办各种“学习班”的场所。这时候，冠县一中改名为冠县城关公社中学，校址在现在教育局和师范的家

属院，只招收高中四个班，学制改为两年，教材内容减少，“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增多，加之“白专道路”“读书无用”的影响，教学质量差是显而易见的。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逐渐肃清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流毒。1977年恢复了原冠县一中的名称，又搬回原校址，逐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工作重点渐渐转移到教学上，建立了规章制度，完善了各种责任制，充实了处室，健全了教研组，恢复了图书室、仪器室和实验室，改善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住房条件。1980年以来，教职员员工住房面积已增建到6500平方米，学生宿舍已增至1300平方米。1987年建大礼堂一座，630平方米。1988年建办公大楼一座，3600平方米。

冠县一中创建38年以来，共招收116个初中班，166个高中班，毕业生不下15000人，可以

说桃李满天下。这众多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的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有的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有的奔赴边疆保卫国防，工作岗位遍及全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仅举几例：张德民（山东省林业厅副厅长）、冯泽顺（山西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申相锋（沈阳军级干部）、程德书（中科院化研所书记）、马心浩（河南省广播事业厅副厅长）、王玉亭（新汶矿务局总工程师）、王指南（邯郸电业局总工程师）、夏雨田（西北工业大学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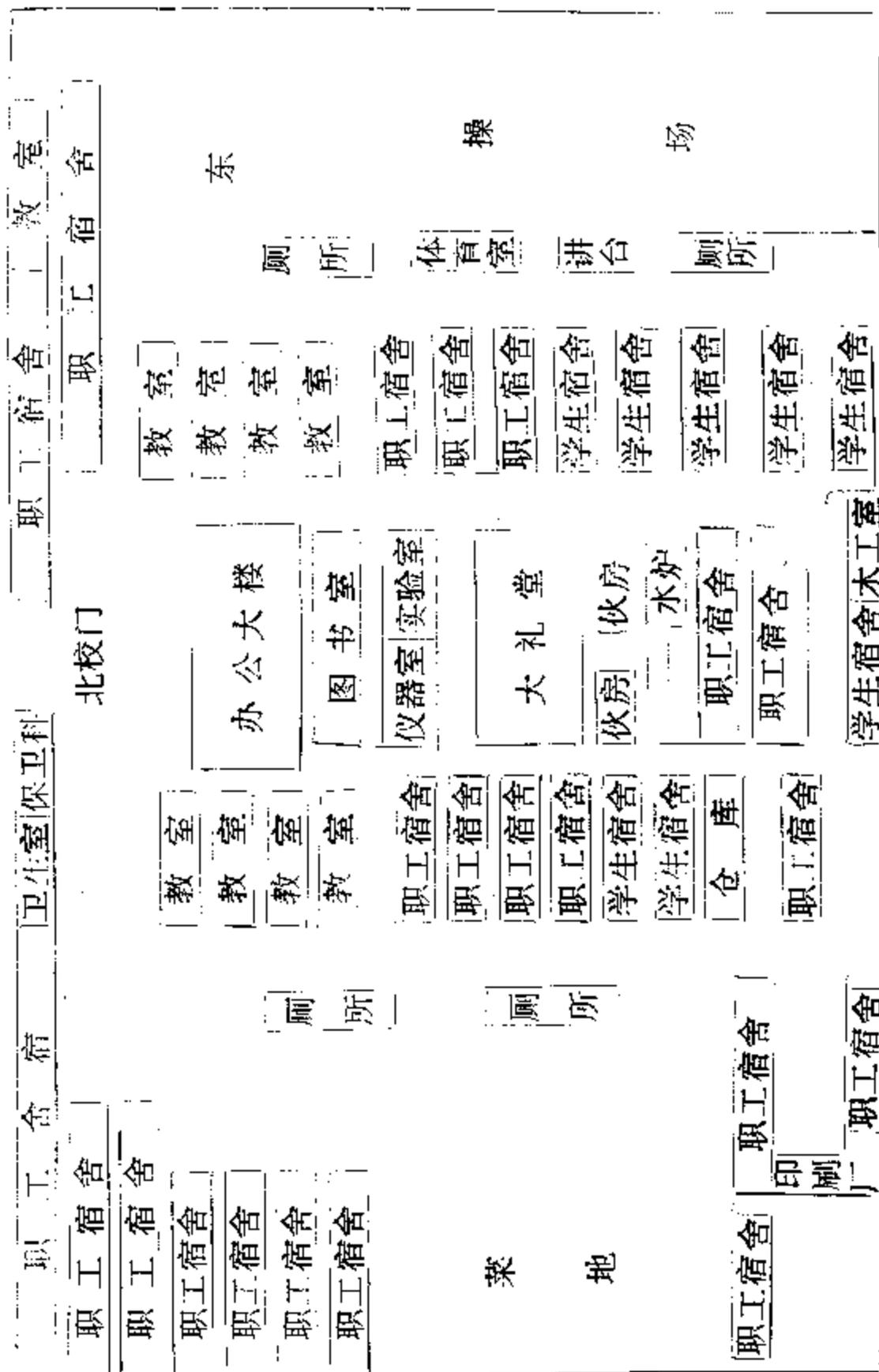
1988年，冠县一中现有教职员工176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40人，专科学历的67人，全校高中24个教学班，初中6个教学班，学生1900人。随着祖国四化建设的变化发展，这所学校已发展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聊城地区重点中学。冠县一中正沿着教学改革的正确道路胜

利前进。

历届领导班子成员

姓 名	职 务	时 间
杨恒一	校 长	1950
杨卓光	校 长	50—54
朱修斋	副 校 长	53—69
郎镜如	校 长	56—58
马相臣	校 长	58—62
张绍虞	校 长	63—70
姜英俊	书 记	70—84
赵培林	校 长	71—85
解桂荣	副 校 长	81—84
王学志	校 长	83—84
宋广田	校 长	84—85
杨立品	书 记	85—
苑文章	副 校 长	84—86
雷丁朴	副 校 长	85—
王学志	副 校 长	87—
苑文章	校 长	87—

冠县一中略图



基督教在冠县

刘圣民 孙学勤供稿 赵秀玲整理

基督教的传入及发展

冠县基督教的传入，至今已近七十年。1918—1920年间，临清的“公理会”牧师彭伯洋派遣传教士张明岭夫妇，首先在夫人寨设教堂，以后又在邢庄，乔庄设堂传教。于此同期，美国牧师陶纯嘏同几个中国信徒王歧山（生前为县人民代表，现冠县政协委员、基督教三自领导小组组长刘圣民的岳父）、张景周、王文博等人，在南陶创办基督教通圣会。因此，南陶就成了冠县通圣会的发祥地。他们又在聊城、阳谷建立了与南陶同样规模的教会。以上三处是基督教通圣会的三个教区。后他们在桑阿镇买

了一块土地，兴建了教堂，盖起了修教人员住宅，为美国传教士丁宝秀修建了一座院落。为了便于三个区之间的联系，陶纯嘏1920年修筑了南陶至聊城的公路（即现在济邯公路路基的一部分）公路全长约150华里，由南陶直达聊城，横贯冠县全境。

1925年耶稣家庭传教人范保江从泰安马庄来冠县传教，在辛集杨洼建立起一处耶稣家庭，人数不多，1940年就停止了聚会。三大派别在冠县最兴盛的是通圣会，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支堂是桑阿镇堂点。在它的影响下，冠县教堂点不断增加，以后相继建立贾镇、辛集、乔庄、县城内、唐寺等教堂点，到解放前夕，冠县共建立教堂点14处。由于教点的增加，信徒的增多，使基督教的活动在冠县能正常开展。

冠县基督教的主要礼节

1、圣诞节：圣诞节在阳历12月25日。这

天由领教人讲述主耶稣降生的事，以示纪念。过圣诞节，形式多样，礼堂内外悬灯结彩，张贴对联，植圣诞树。有的还组织临时演唱班，演圣诞短剧、唱圣诞颂歌。

2、复活节：在每年春分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以纪念主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

3、洗礼：洗礼是为新入教的信徒进行“施洗”。根据当时的条件和受洗人的要求，又分为大洗（浸水洗）、洒水洗和点水洗。

4、圣餐礼：举行圣餐礼时，先烙一个饼，以代表主耶稣的身体，由牧士掰成若干份，信徒们每人领一份，以表示“共领主的身体”。分饼后，信徒们每人饮一杯红葡萄酒，表示“共领主的血”。是对主耶稣降生复活的纪念。

5、婚礼：婚礼是为信徒和信徒子弟结婚时举行的一种仪式。由领教人通过讲唱圣经的重点章节，要求新婚夫妇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并渡美满的生活，并通过婚礼向新婚夫妇进行尊老爱幼和睦四邻的教育，使之家庭团结，四邻友好。其唱词是：

①今日聚集大家欢喜，照主旨意恭行婚礼，新郎新妇结合为一，一家一体，一心一意。

②从此一生同走天路，互敬互信，相爱相助；天父时常保佑平安，免除灾害、困苦、艰难。

③恳求天父赐福盈门，使他夫妇均占洪恩；圣灵感化，敬爱救主，一生专心事奉天父。

④但愿天父听我所祷，使他夫妇恩爱偕老；快乐同享，苦难同当，一生一世主前颂扬。

6 丧礼：丧礼是为老信徒或信徒长辈去世时举行的一种仪式。通过讲唱圣经的重点章节，说明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要抓住这个时机，

“生前荣耀主，亮节照后人”。同时还要追述死者的功绩及优良的品德，以便后人学习。其唱词是：

①睡主怀中，何等清福，从未有人醒来哀哭，清静安宁和平快乐，不受任何敌人束缚。

②睡主怀中，何等甘美，四周唯有温暖的爱，醒来尽可放心歌唱，死亡已失旧日权威。

③睡主怀中，何等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救主权能彰显之日，再无忧愁、祸患艰难。

④睡主怀中，虽离亲族，醒后相逢更加欢乐；睡主怀中，无穷清福，从未有人醒来哀哭。

冠县基督教近况

1941到1965年；因战事，日本封锁了教会，陶纯赟于1941年回国。美国传教士、部分中国传教工作人员相继撤离山东回天津。另外

一些教徒有的改行，有的回到原籍务农，剩下少数信徒，宗教生活也转移到个别信徒家中。文化大革命时，所有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个拨乱反正，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恢复和落实，在个别信徒家中设堂点、过宗教生活的方式也恢复起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县基督教代表会，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制定了信徒爱国公约，冠县的基督教和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一样，热烈拥护“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旧教会的派别，建立了“冠县基督教三自爱国领导小组”，刘圣民为组长，孙学勤、谷恩临为成员。冠县基督教现有7个活动点：①贾镇西赵店村，信徒约130余人。领教人刘圣民；②桑阿镇，信徒约180人，领教人谷恩临；③贾镇王谈二寨，信徒约160人，领教人王进详；④梁堂

乡安庄，信徒约180人，领教人孙学勤；⑤辛集街、信徒约120人，领教人边宝起；⑥斜店乡许盘，信徒约100人，领教人马雪琴；⑦柳林，信徒约80人，领教人杜文辉。

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指导下，在基督教“三自爱国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冠县基督教各活动点，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活动走上了正规化。信徒们牢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宗旨，团结一致，为早日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积极贡献力量。

元好问和赵天锡

任金光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他于金宣宗兴定五年考中进士，历任镇平、内乡县令，及吏部主事，左司都事员外郎诸职。元好问能诗善文，而以诗著称。一生留诗一千六百余首，为金末诗风变革的杰出代表。他的诗一反当时文坛以“风花月露，浮词艳语”为主的恶劣倾向，回复到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他的诗常以金末元初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蒙古侵略者的凶残暴虐为主题，其间虽然难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社会状况的无比黑暗。他的诗远师杜甫，

近学苏轼，风格雄浑开阔，情辞沉郁悲凉，堪称金元时期的一代诗宗。本文所要介绍的，是这位文学巨匠在冠县渡过的四年困苦生活。

公元十三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族在中国北方崛起，女真族完颜氏所建的金朝政权，因不堪蒙古军的频频袭扰，不得不于公元1214年从中部（今北京）迁都汴京（今开封），以避其锋。由此，连绵的战火，便烧到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232年春，蒙古大汗窝阔台率铁骑南犯，两度围困汴京。1233年，金汴京守将崔立开城投降，当时正任左司都事员外郎的元好问及其眷属和金朝百官一起，成了蒙古军的俘虏，于五月初三日被押送到聊城，开始了两年的监押生活。直到1235年，才被人救出囹圄，来到冠氏（今冠县）定居。救他的便是当时的冠氏县令赵天锡。

赵天锡，字受之，祖籍冠氏。其祖父辈都是

当时的地方豪强，在战乱中，曾组织地方武装保卫乡土，因而受到人民的拥戴。赵天锡二十岁时，因捐粮佐军而被任命为洛水县酒监这样一个小官。后来，他归顺蒙军，投到东平大行台严实的帐下效力，因屡立战功，后来升为佐副元帅，同知大名府路兵马都总管事，阶镇国上将军。1233年金亡时，赵天锡经严实推荐，又被授予行军千户，并赐金符。虽然他所处的正时兵荒战乱的年代，各级官员，只知“驰逐射猎之事”，文章道德，无人顾及；有的官员甚至“不能执笔记名姓，”但赵天锡却独具慧眼，能够重知识，重人才。他“在军校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其所与游，皆天下名士”。那时候，金朝灭亡，文人学士，有的沦入敌手，有的流落民间。经赵天锡之力，“脱之于俘虏，活之于屠戮者，”为数当在不少。据记载，当

时会依附于赵天锡的人，除元好问之外，尚有著《还山东》三十卷，《正统书》六十卷，号称“关中名士”的扬奭杨紫阳，及生前做过元世祖忽必烈的参知政事（丞相）死后封为“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的商挺商左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行伍出身的赵天锡，确有过人的眼光、胆识和胸怀。

元好问是在1235年来到冠氏的。他在赵天锡的帮助下，过上了虽苦却较为安定的日子，并得以创作出不少优秀诗文。至于诗人那一段生活的具体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已难考证，我们只好据其作品做一番大略的描述。可以知道的是：元好问来到冠氏，寻得三亩多菜地，费时八十余天，盖起茅屋数间，安顿了家小。事见其诗《学东坡移居》“废地三余亩，十年长蒿菜，瓦砾杂粪土，白骨深苍苔。孤客无所投，即此营茅斋”。“伐木荒野中，远望古城

隈（城角），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谐。”在冠氏居留期间，元好问虽然常在赵天锡处参加“燕享犒劳”“投壶雅咏”但赵在经济上对他的帮助似乎并不太大。他诗中曾说：“诸公颇相念，亲粒分凫（鸭子）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意思是说：诸位虽然很关心我，剩下的食物分给我吃，无奈我得到的救济和所需相差太远，好象一把土填进巨大的山谷那样，无济于事。所以他一家人仍旧过着极艰苦的日子。其时，诗人一家十口，除自己的亲人外，可能还收养着一个孤儿，即后来成为元朝著名散曲作家的白朴。他当时的生活，可谓饥寒交迫：“一冬不制衣，缁衣（行衣服）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灰灰菜）。”诗人自己凭了知识分子的孤傲之气，尚可安于贫穷的境遇，但一见到孩子们无衣无食，就“儿辈饭箩空、坚阵屡为却”了。寥寥数语，辛酸可

知。即是这种情况下，元好问的诗也并非全是愁苦怨贫之作，有些小诗写得流利清新如《自赵庄归冠氏》：“杏园红过雪披离，杨柳无风绿线齐，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鸦墙外尽情啼。”读了以后，冠县七百年前的郊野春光如在眼前。

在冠氏四年中，元好问曾几次出游，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1235年7月，他受朋友之邀去济南游历，写下了《济南杂诗》十首及《汎舟大明湖》等诗。对济南的山光水色做了生动描绘。1237年3月，他出游河南黄华山（今河南林县西北），为那里的瀑布奇观所倾到，留下了名篇《游黄华山》，1238年秋，他回山西忻州探家，到冬天方返回冠氏。一路上越太行，出雄关，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寄感慨于笔端，写下了《卫州感事》《天井关》《羊肠坂》等诗。这年春，他应东平大行台严

实之召，赴东平讲学又写下了《出东平》等。

从元好问在冠氏所写的诗文中，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首先，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元好问，满怀国破家亡之恨，此时痛定思痛，作品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痛悼，对往昔的怀恋。如他的《卫州感事》之一写道：

“神龙失水困蜉蝣，一舸仓皇入宋州，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三楼，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在这种心境之下，他即使面对素所偏爱的杏花也难免触景伤情：“文杏堂前千树红，云舒霞卷张春风，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冠氏赵庄赋杏花）。其次，流落异乡的痛苦，坎坷艰辛的生活，使元好问的诗充满对家乡的思念。冠氏的秋风秋雨，冠氏的芳树平田，都能引起诗人的悠悠乡情。他的《三仙祠》一诗写道：“吹残芳树红

仍在，碾破平田绿已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在《雨夜》一诗中又这样道：“梦里孤篷雨打秋，茅斋原更小于舟”。“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最后应指出的一点是，金亡以后，元好问为了不使故国的文史资料散失，决心脱离政治，致力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此决心起于聊城的监押时期，而坚于冠氏的居留期间。他的《学东坡移居》八首，有一首便是专讲此事的。他先说保存国史的重要：“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十年后，时事无人知。”至于民间的文学艺术，作者也给予很高评价：“弊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赵本良在兹。”诗人把收集这些资料，做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表决心道：“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后来，元好问果然这样

实践了自己的决心。回到故乡后，他四方奔走，廿春秋；终于编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二书，内容达百余万言，成为后人编写《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渡过四年的苦难岁月之后，元好问终于在1238年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乡秀容。虽然他归心似箭，但由于和赵天锡的友谊，以致于“留连郑重，数月不能别。直到这年七月，窝阔台挥师伐宋，赵天锡奉命随军南征，元好问一家十口才告别冠氏，与大军同行至新乡。据元好问的《千户赵侯神道碑铭》所记，他和赵天锡新乡分手前夕，“置酒行营中，夜参半，把烛相视，不觉流涕之覆面也。”第二天，赵天锡不忍对面话别，使人留语云：“欲与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自己上马，疾驰而去，不反顾。可见，赵天锡与元好问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遗憾的是，他们彼此分手

竟成永诀。赵天锡随军南下，不久因病还乡，一年后，死于冠氏县城。元好问在冠县虽仅四年，但他和赵天锡的这番友谊，载入冠县史册，传为佳话。

查拳名师张英振之子来信

冠县政协同志：

您好！

远方游子万里奔驰，已不识桑梓面貌。今捧读舍妹张铜霞转来《冠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其中刊载家父查拳名师张英振事绩，至为铭感。

我自1920年8岁时由南京返里，家居不及半载，兹后迄未重睹故里景物。抗战军兴，由南京现代中学入川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历任军职。1949年在北平军官训练班中队长任内，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任中学教师。其间右派坎坷凡23年。年逾花甲，早应退休，但工作需要，现仍在北京八十八中学工作。

及闻乡里胜况，无任神驰，拟今年暑假返里一行，藉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为北京政协及民革介绍实况，以资促进工作。

现九年义务教育制推行以来，以国家财力所限，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诸贤达人士，共促大业。余容面谈。

敬祝政躬健康，工作顺利。

民革北京宣武区二支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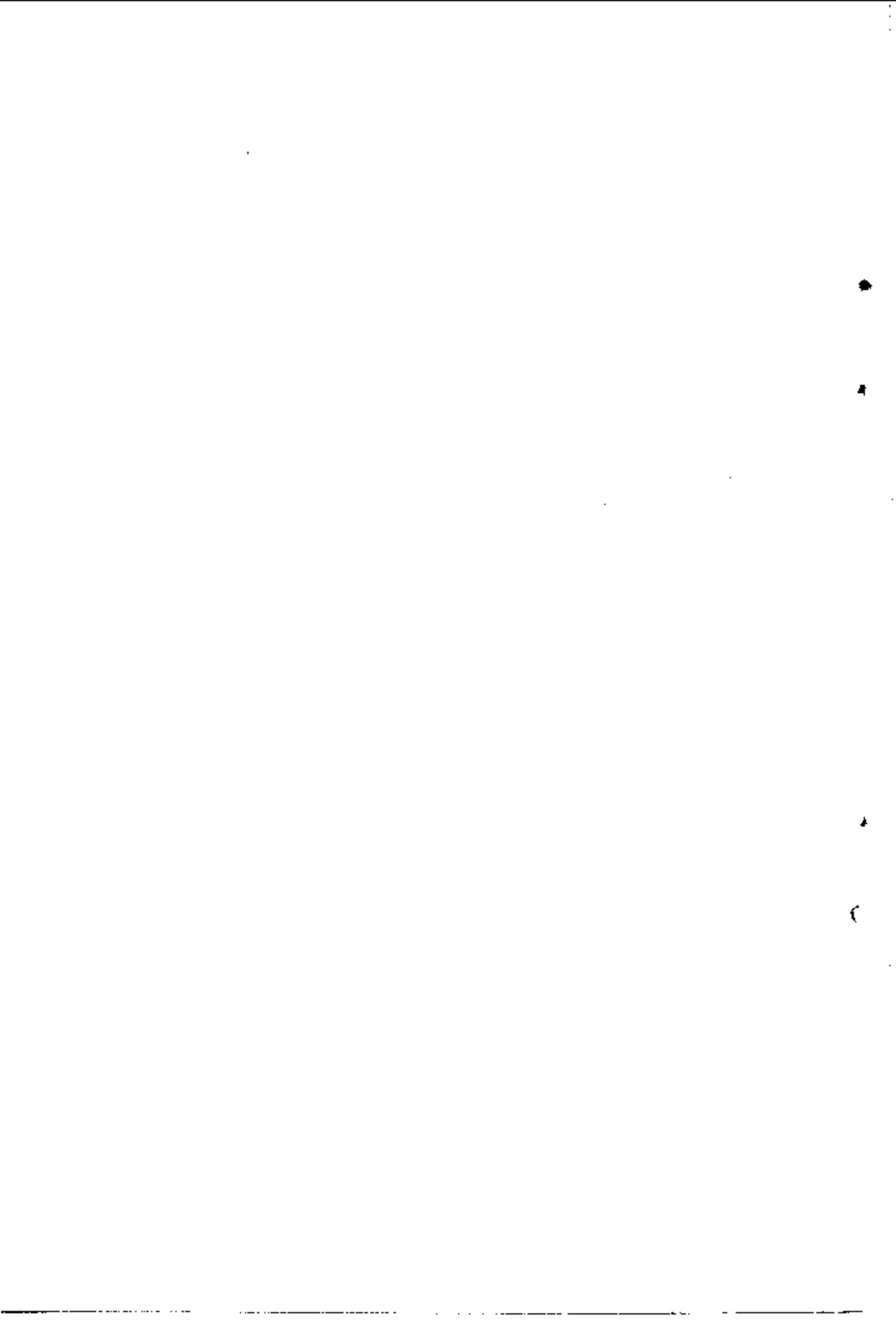
黄埔军校同学会员

北京宣武区政协委员

北京八十八中学政教处

张子忠

1988年5月1日



冠县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征集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为丰富祖国文化遗产，服务于四化建设，我们向熟知我县情况的革命老前辈和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征集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倡导的，它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搞好文史资料工作，能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及海外爱国人士，激发爱国热情，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大团结有着特殊的作用。

地方性的文史资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特殊功能。

冠县地处鲁西平原，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冠县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奋搏前进，谱写了无数光辉的篇章。冠县既是农民起义英雄的故乡，又是革命爱国志士的摇篮，史料丰富珍贵，可谓广征有物，博采有人，

文史资料的征集时限一般为辛亥革命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内容包罗万象，发生在我县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界别有记载价值（包括敌、我、友三个方面）的材料、实物、照片等均在其列。希望撰稿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文史并重，史重于文”“多说并存，文责自负”的精神，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写出来或说出来，以丰富和完善我县近、现代史资料。

稿件可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限篇幅，不求完整。做到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让事实说话，经得起历史的

验证。

来稿请寄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科，更盼历尽沧桑的老革命干部和文史资料的知情人，亲自交稿，当面指教。

1988年10月

冠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	康国义			
副主任	吴珍堂			
委员	张怀轩	曹树椿	许正坤	
	崔子崇	焦灼	安文彬	
	赵长聚	表道雄	郝文萱	
	吕德书	郝瑞琛		
主编	张怀轩			
副主编	曹树椿			
编辑	焦灼	安文彬	赵长聚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冠县文史资料 · · 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0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